

譯 者 的 話

1957年夏，美国北卡罗来納州門罗城的黑人，在罗伯特·威廉的领导下，拿起了枪杆，对美国种族主义分子的攻击和迫害进行了武装自卫，赢得了很大的胜利。《带枪的黑人》主要就是围绕这次事件阐述了罗伯特·威廉对美国黑人斗争的观点和主张。

这本书原是美国记者马克·谢勒弗根据罗伯特·威廉在古巴避难时对他发表的一次录音谈话编纂而成，并根据威廉发表在《十字军战士报》和《左翼研究》上的一些文章作了补充。为了使读者对这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的思想和观点有更好的了解，我们在翻译这本书时，对原书的编排略为作了一些变动。我们删去了原编者的《编者说明》和《后记》，并把放在罗伯特·威廉正文前面的马丁·路德·金牧师和研究约翰·布朗及废奴运动的学者杜鲁门·纳尔逊的文章，改为附录放在本书后面。

由于美国统治阶级长期的欺骗宣传和分化、破坏活动，美国黑人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几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和主张。十九世纪末在美国黑人中有过很大影响的布克·华盛顿，就曾鼓吹黑人学习实用技术、培养忍耐性，反对黑人参加政治活动。这种主张的影响所及，只能起瓦解黑人斗志的作用，对黑人的解放事业是非常有害的。今天，提出像布克·华盛顿那样主张的人面然是渐渐少了，但是这种主张的影响，在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中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还有相当多的人仍然幻想用非暴力的手

段來解決問題。但是，這類主張正越來越遭到有見識的黑人領袖和學者的批判和指責。

殘酷的現實教育了廣大美國黑人：爭取自由、平等權利和自身解放，是不能依靠向反動統治階級的良心乞求的，統治階級的法律是解決不了被壓迫階級的問題的。正如羅伯特·威廉所說的，“要對種族壓迫這樣根本性的問題進行社會變革，就需要用暴力。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暴力和翻天覆地的變革是不能有進展的……”。羅伯特·威廉的主張，一直就是美國廣大黑人的主張。

目前，美國黑人爭取自由和平等權利的鬥爭正在一浪高過一浪地向前發展。今年4月在伯明翰開始的黑人示威運動，不僅在規模、在鬥爭的方式上是空前的，而且在持續的時間上也是空前所未有的。當然，正如毛澤東主席所說：“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美國黑人弟兄的鬥爭是和美國全體被壓迫階級爭取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鬥爭密切聯繫在一起的。面對着日益法西斯化的美國的統治階級，美國黑人弟兄的解放還要經過非常艱苦的努力。但是，“未來屬於今天的被壓迫者，我將在美國黑人的解放中親眼看到這個未來”。我們深信，羅伯特·威廉這一句話體現着千百萬美國黑人的理想和願望。美國黑人弟兄，最後一定會同各色人種包括白人在內的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大眾一道，成為美國真正的主人。

我們所以翻譯這本書，也正是因为我們衷心地懷着這樣一種殷切的願望。

1963年9月



罗伯特·威廉



罗伯特·威廉及其夫人梅蓓尔 1962 年 3 月
在古巴哈瓦那。

WANTED BY THE FBI

INTERSTATE FLIGHT - KIDNAPING ROBERT FRANKLIN WILLIAMS

Photograph taken May, 1961

FBI No. 84,275-8



Aliases: Bob Williams, Robert F. Williams.

DESCRIPTION

Age:	36, born February 26, 1925, Monroe, North Carolina	Complexion:	dark brown
Height:	6'	Race:	Negro
Weight:	240 pounds	Nationality:	American
Build:	heavy	Occupations:	free lance writer, freight handler, janitor, machinist
Hair:	black		
Eyes:	brown		
Scars and Marks:	scar left eyelid, scar left nostril, scar on collar of right leg.		

Fingerprint Classification: 19 L 1 R 100 8 Ref: T R T
M I T IO A A 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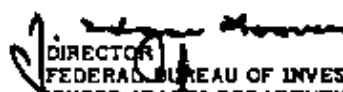
CAUTION

WILLIAMS ALLEGEDLY HAS POSSESSED A LARGE QUANTITY OF FIREARMS, INCLUDING A .45 CALIBER PISTOL WHICH HE CARRIES IN HIS CAR. HE HAS PREVIOUSLY BEEN DIAGNOSED AS SCHIZOPHRENIC AND HAS ADVOCATED AND THREATENED VIOLENCE. WILLIAMS SHOULD BE CONSIDERED ARMED AND EXTREMELY DANGEROUS.

A Federal warrant was issued on August 28, 1961, at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charging Williams with unlawful interstate flight to avoid prosecution for kidnaping (Title 18, U. S. Code, Section 1073).

IF YOU HAV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IS PERSON, PLEASE NOTIFY ME OR CONTACT YOUR LOCAL FBI OFFICE. TELEPHONE NUMBER IS LISTED BELOW.




DIRECTOR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WASHINGTON 25, D. C.
TELEPHONE, NATIONAL 8-7117

Wanted Flyer No. 290
September 6, 1961

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罗伯特·威廉的公告。中为罗伯特·威廉的照片。照片上端标有“緝拿越州潛逃的綁匪罗伯特·富兰克林·威廉”字样。照片下端为罗伯特·威廉的容貌特征等的说明。再下面是注意事项，诬蔑罗伯特·威廉藏有大量军火、患精神分裂症、鼓吹使用暴力、为人极端危险，等等。



在佩里家中。左起第一人为佩里，第二人为罗伯特·威廉。



在佩里家中的武装自卫队

on or about 4th Sunday
of Aug 1961. I was in
the Union County Jail
on 3 charges of worthless
checks and two assault
charges. The Monroe police
and deputy forces of the
city of Monroe put to
me a proposition if I
would let force assault
out of the Jefferson
Orleans Parish they
would let I went
free of my charges. This
being I said in the
Union Jail in the Union
County Jail. I went free
for 3 weeks and paid
fines each week and returned
to the prison which
was known to be open
for the 11 assault I did
five times they turned
their backs on me and
why I went to this
Howard Black

这是霍华德·斯塔克亲笔写的供词，供认他在门罗警察局的指示下，
殴打年轻的“自由乘客”理查德·格里斯沃尔德。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自卫防止了流血.....	4
第二章 一个有色人种协进会分会在战斗中重生.....	11
第三章 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战斗性而斗争.....	23
第四章 非暴力助长了种族主义者的气焰：恐怖的一周.....	33
第五章 自卫防止了屠杀：种族主义者制造的綁架騙局.....	41
第六章 門罗事件：迫害黑人的阴谋.....	49
第七章 自卫：美国的傳統.....	63
附 录：	
“仇恨总是悲惨的”.....	馬丁·路德·金 78
非暴力的社会組織.....	馬丁·路德·金 80
反抗精神.....	杜魯門·納尔逊 85

序 言

为什么我要在流亡中对你们说话呢？

因为南方的一个黑人居住区在反对种族暴行的自卫行动中拿起了武器——而且使用了它们。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美国的黑人终于作为一个集体武装起来，在那些法律和秩序已经遭到破坏、当局不能或者不如说不愿负责保护美国人不受不法之徒侵袭的地方，来保卫他们的家庭、妻子和儿女。我被认为应对这一行动负有责任。我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并且引以为荣。我主张黑人有权对三K党的暴行进行武装自卫——并且就是照着这样来行动的。我们西部各州的历史证明，在那些法律不能，也不愿维护秩序的地方，公民们就能够，而且必须对不法的暴行实行自卫，这是美国人民应有的权利。我相信这种权利既适用于白人，也同样适用于黑人。

许多人一定会记得，1957年夏天，三K党对南方的一个印第安人居住区发动了武装袭击，遭到了起来自卫的印第安人的坚决开枪回击。全国都赞同印第安人的这一行动，并且普遍对那些掌有优势武装而勇于逃命的三K党徒的失败感到高兴。全国人民因为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所以还不知道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城的黑人居住区所树立的典范，那就是：在两个星期以前，我们开枪击退了前来侵袭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门罗城分会副主席艾伯特·E·佩里住房的三K党的武装汽车队，其中有两辆是警车。我们分会所持的立场终于使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再一次正式肯定了自卫的权利。1959年7月，在纽约举行的第五十

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大会決議的前言說：“……我們不否認，而且再次肯定个人和集体对非法的暴力有自卫的权利。”

因为人們对我的立場作了很多歪曲，我願意在这里澄清一下，我并不主張为暴力而暴力，也不主張为了对白人进行报复而采用暴力。我也并不反对馬丁·路德·金牧师等人所鼓吹的消极抵抗态度。我和金博士之间的唯一分歧在于我相信自由斗争的灵活性。这就是說，我贊成在能够收效的地方才使用非暴力的策略，只要指出，我还在等候最高法院就“入座示威”案作出判决这一件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群众性的非暴力抵抗只有在文明的条件下，在法律保障公民进行和平示威权利的地方才是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在文明的社会里，法律对那种足以破坏民主程序的不法力量是一种威懾的手段。但是在法律遭到破坏的地方，每个公民就有权利起来保护他的人身，他的家族，他的家庭和他的财产。对我來說，这是十分简单的，名正言順的，不言而喻的。

当被压迫的人民表示出有保卫自己的决心的时候，作为道义上的弱者和懦夫的敌人就会更願意作出让步，更願意謀求妥协。况且，从心理上說，种族主义者总是把自己看作是优等的人种，是不会願意以他們优等的生命来換取我們低等的生命的。如果他們的暴力行为能够不受到制裁，他們就会采取最凶恶、最暴戾的态度。我們曾經在門罗事件中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如果由于我們的自卫而使白人有流血的危險，那末原来对不法的种族暴行采取放任态度的南方地方当局就立刻会維護法律和秩序。这一点我們也在門罗事件中证明了。当黑人准备以武器保卫自己的时候，国家和地方当局的警察是多么容易和迅速地控制和驅散不法之徒啊。

还要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关系，联邦政府不願意让种族事

件把全世界的注意力吸引到南方的局势上去。黑人的自卫行动恰恰吸引了这种注意力,因而即使地方当局不愿意,联邦政府也比较愿意维护法律和秩序。当我们的人民成为战斗者的时候,我们的领袖就能够以对等的身份,而不是仰压迫者的鼻息和依靠恩赐,坐在谈判桌上。只有这样,双方才会都利于通过谈判达成公正的、光荣的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在美国的大多数白人对南方黑人每天每日,不,每时每刻都在忍受的暴行,事实上是没有什么概念的。这种暴行是经过精心策划,有意识地进行的,而且是得到当局容许的。这种暴行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一直到今天,无日无时曾经停止过,放松过。这就是我们黑人的生活方式。美国南方的黑人一直过着一种漫长无边的痛苦生涯,它沾满了恐怖和鲜血——我们的鲜血。在门罗城发生的事件是我亲眼看到的,而且是我亲身忍受过其痛苦的。它将使人们对南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的情况稍有一点概念。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内战开始一百年后,我们在门罗城的黑人在自卫中武装了自己,而且使用了我们的武器。我们的行动说明我们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门罗城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执法当局只有在他们武装起来之后,而且只是由于我们武装起来的結果,他们才终于不得不维护秩序。在此以前,他们在针对我们黑人的种族暴行中,对三K党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只有自卫才能防止流血和迫使司法机构建立秩序。这就是门罗事件的意义,而且我相信这标志了我们人民生活中的一种历史性转变。这本书就是叙述那一转变的始末的。

第一章

自卫防止了流血

1961年6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門罗城分会决定在本市的游泳池四周設置糾察綫。这个游泳池是用公共工程管理局的錢建造的，但却禁止黑人使用，虽然我們黑人在这个城市的人口中占了四分之一。1957年，我們沒有提出要求游泳池实行种族合一，只要求每星期使用游泳池一天。这个要求被拒絕了，在那以后四年中，我們一直被含糊其辞地搪塞着。他們說，日后会另外建造一个游泳池的。在那个期間，有两个黑人小孩子在小河里游泳淹死了。就这样到了1961年，門罗城政府当局宣称，它有了剩余的款項了，但却沒有見到什么游泳池，甚至也看不到有什么建造游泳池的意图。所以我們决定在游泳池設置糾察綫。我們設置了这道糾察綫，把游泳池团团封住了。在游泳池被封了起来之后，种族主义者就决定用南方傳統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他們訴諸暴力，非法的暴力。

我們在那里糾察了两天之后，开始在中午的时候到一个“只限白人”专用的野餐地区吃飯。在野餐区的对面，在一条小河的对岸，一群白人朝我們开了枪，我們能够聽見子彈在穿过我們头上的树木时的声音。警长正在游泳池那边值勤，我就呼吁他制止他們向野餐区开枪。警长說，“我沒听见，我什么也沒有听见。”那一天，白人一刻不停地放着枪。到了第二天，这些白人边放手枪，边向糾察綫挨近过来。我們仍然向警长呼吁，要他禁止他們在我們附近放枪。他还是說，“啊，我什么都沒听见。”

游泳池仍旧不开放，我們繼續守着糾察綫。数以百計的人群跑过来，大声辱罵参加糾察的人。暴行的可能性当时增加到了—触即发的程度，我們只得拍电报給美国司法部要求保护我們进行糾察的权利。司法部要我們去找当地的联邦調查局。我們去夏洛特見了当地的联邦調查局，他們說这件事不應該由司法部来处理，这是件地方事件，他們已向我們地方的警长查核过，警长向他們保证一定給我們以充分的保护。这位警长就是当这些人朝我們头上放枪时，站在那里袖手旁观的那一位警长，也就是1957年曾經派两辆警車参加三K党的汽車队去襲击黑人居住区的那一个警长。

想謀害我

1961年6月23日星期五，我到城里給司法部又打了一个电话。我在那里順便捎上一个糾察員，回到城郊的游泳池的糾察綫上。当我的汽車沿着美国第七十四号公路向东轉的时候，一辆1955年式的《德索托》牌大型轎車，从后面赶上前来，企图迫使我所駕駛的英国《希耳曼》牌輕型小車越出堤防，从七十五英尺高的一堵悬崖上落下去。我加快速度超到他的前面，制胜了他。于是这个人就从后面向我的汽車冲撞，我們的車擋鎖在一起了，他开始左拐右拐地在公路上行駛，企图把我那輕型的汽車弄翻。我車上的車擋已經卡住了，我沒有用煞車，因为我怕車子的前輪失效。

我們正好必須路过公路上的一個加油站。这个站是在行車速度不得超过三十五英里的地带中。當我們經過这个加油站的时候，另一辆車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追着我們。我开始不断地按我的喇叭，希望引起公路上的巡邏队的注意。有三个巡

邏警正好在加油站廣場的堤防對面。他們對那個推着我的車在公路上曲折行駛的人看了一眼，然後兩手一撒，哈哈大笑一陣，就掉轉屁股不管了。

他一直推了我四分之一英里之遠，推到車輛來往非常頻繁的一條公路的十字路口。這個人希望把我逼得和來往的車輛相撞，但是在大約離公路七十五英尺的地方，我終於擺脫了他的車擋，急轉彎駛進了陰溝里。

我的車子壞了。煞車箱、車輪和軸承都壞了，汽車後身的行李箱給撞得凹了進去。我們把車從陰溝里弄出來之後，我就把車子弄回游泳池那里，並且給警長看。他站起來，看了看車子，呵呵笑着說，“我看不見什麼東西，我什麼也沒有看見。”我說，“我離開這裡時你正在這裡站着哩。”他說，“嗨，我還是什麼都不知道。”我要他出一張拘票把我所指認的這個人押起來。這個人就是邦迪亞克—雪弗蘭汽車公司在門羅城的經銷商拜納姆·格里芬。他說，“我不能發這樣的拘票，因為我看不出他做了什麼壞事。”但是那時站在那裡的一個新聞記者開始察看我的汽車的損傷來了。警長一看見新聞記者感到興趣，就說“好，到警察局來，我給你發拘票吧。”

當我到了警察局的時候，他說，“嗨，你只知道這人的名字和車照號碼，我不能就那樣對一個人提出公訴。你可以把這件事和法院的律師商量一下。我去見了法院的律師，其地位相當於區檢察官，他說，“你只知道一個名字和一張執照上的號碼，我不能就根據這些對這個人提出公訴。”我告訴他我認得這個人，而且說出了他的名字。他說，“等一等。”於是他掛了個電話。他說，“我給他打過電話了，他說他沒有干過那樣的事。”我又告訴他，我認得這個人，而且我有他所駕駛的汽車的執照號碼。最後法院的律師說，“好吧，既然你堅持，我就告訴你怎麼辦吧。你到他

家里去看一看，如果你认出是他的話，就把他帶到这里来，我就发拘票拘捕他。”我告訴他，那應該是警察的事；他們既然拿了人民的俸祿，就應該去把罪犯抓来归案法办。但是他們根本拒絕了給我出一張拘票把这个人拘捕起来。

* * *

“媽的，黑鬼有枪！”

糾察綫繼續守着。我們在那个星期天到游泳池去，途中必須經過同一个路口（第七十四号和第六〇一号公路交叉的地方）。那里大概有两三千人沿公路排列着。有两三个警察站在路口指揮着来往的車輛，还有两个警察一直从我們家里起就跟着我們。有一辆沒有窗子的旧貨車停在路口的飯店旁边。當我們駛近的时候，这辆車子用最大速度突然往后一退。这辆車子的司机希望拦腰撞击我們，把我們撞倒。但是我把方向盘猛轉，于是这辆破車撞着了我的汽車的前部，两个車都掉进了沟里。

人群尖叫了起来。他們說一个黑鬼冲撞了一个白人。他們正指的是我。他們叫着嚷着。“杀死这些黑鬼！杀死这些黑鬼！用汽油澆在黑鬼身上！燒死这些黑鬼！”

我們不动声色地坐在車里。那辆旧車的駕駛員从車子里走出来，手里拿着棒球棍，对着我們走来，說，“黑鬼，你为什么要撞我？”我什么也沒对他說。我們仍然坐在那里望着他。他走近我們的車，棒球棍离我們只有一臂之差，但我仍然一言不发，我們的車子也不移动一步。他們不知道我們是有武器的。根据北卡罗来納州的立法，汽車里帶武器是合法的，只要你不把武器隱藏起来。

我在汽車里帶了两枝手枪和一枝来福枪。当这个家伙开始

把棒球棍举起来的时候，我把一枝軍用四十五毫米口径的手枪在汽車窗口一放，把枪口正对着他的臉，一言不发。他看看手枪，什么也沒有說，从我的車那里縮了回去。

人群中有人放了一枪，人們又神經质地嘶叫起来，“杀死黑鬼！杀死黑鬼！用汽油澆在黑鬼身上！”暴徒开始朝我們的車頂扔石子。我就打开了車門，一脚跨下地去，托着一挺意大利式的卡宾枪站立在車門边。

在这整个時間內，三个警察一直都是站在离开我們五十英尺的地方，我們一直在車里等着他們来搭救我們。当他們看見我們帶有武器，暴徒不能抓住我們时，两个警察就奔跑过来。一个跑到我的跟前，一把揪住我的肩膀說，“放下你的武器，放下你的武器！”我朝着他的臉一拳把他从我的車那里打了回去，把我的卡宾枪对准着他的臉，告訴他說，我們不会对暴徒投降。我告訴他我們并不会听凭私刑吊打。另一个在我汽車側面跑过来的警察正要从枪套里掏出他的左輪手枪，希望从背后給我一枪。他們沒想到我們不是只有一枝枪。学生中有一个十七岁的青年把四十五毫米口径的手枪对准警察的臉，告訴他說，如果他敢掏出枪来，就打死他。这个警察就把枪放回枪套里，从我的汽車那里倒退回去，掉进了沟里。

人群里走出一个年紀很大的白人。他像一个嬰孩似地大哭大叫。他边哭边說，“媽的，媽的，他媽的，这还成个什么国家，黑鬼居然有枪，居然武裝了起来，警察甚至逮不住他們！”他痛哭流涕，最后有人把他从人群里扶走了。

只有依靠自卫，才能得到保护

門罗市議会的議員斯蒂夫·普雷森来了。他告訴警长开放

公路，把我們弄走。警長告訴議員說，“他們有槍呢！”普雷森說，“別管那。把公路開放讓他們走吧！”他們開放了公路，那位市議會議員帶領我們走了出來。在大路兩側，排列着的人群大概有三分之一英里那麼長。他們嘶叫着，“殺死這些黑鬼！殺死這些黑鬼！不許在這裡實行種族合一。不同黑鬼子一起游泳！”

在我們快到游泳池的時候，別的一些陸續前去的学生早已組織了糾察綫。在游泳池四周大約有三四千個白人。全城的官員，包括門羅城的市長都在那裡。他們戴着墨鏡在人群中站着。人群不斷地嘶叫着。警長跑到我的跟前說，“繳出你的槍！”我告訴他我什麼槍也不繳。我們的那些槍是合法的，而他們是一群暴徒，如果他要那些槍的話，他可以在我們離開這裡之後到我家里來拿。他說，“好，如果你傷害了這裡的任何一個白人，你媽的，我就槍斃你！”我不知道什麼東西使他認為我會讓他活得那樣長來槍斃我。他在四周白人嘶叫声中不斷地說，“放下槍來！”

那個市議員又出現了，他說緊張不好，會傷人的。他承認我有權利參加糾察。他又說，如果我願意回家，他就會考慮派人護送。我問他誰來護送我們回家。他說，“警察。”我告訴他，如果可以和他們一起回去，那我也可以和三K黨一起回去了。我說只有在一個條件下我才和警察局的人一起走。他問那條件是什麼。我說，我讓我車里的学生下來一個，由他們換一個警察上來，我才放心，才會感到他們是會保護我們的。警察說，他們不能那樣辦。他們所以不能那樣辦，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同暴徒一起行動，那末這個警察是會受到傷害的。

那些官兒喋喋不休地說人群是怎樣地不能控制啦；也許會傷什麼人啦。我告訴他們，我決不離開那地方，除非他們從公路那邊撤退干淨。我也告訴他們，如果必要的話，我們將在那裡堅

持下去。最后他們問我，建議他們怎么办，我建議他們同州政府的警察当局联系。因此他們同州警察当局进行了联系。州警察当局派来了一个年老的班长和一个年輕人，一共两名州巡邏警。那里的人有三四千之多，而全城出动的警察有二十一人，他們說无法維持秩序。

老头儿一面咒罵着，一面要人們后退，散开或离开那里。他揮舞着棍子。暴徒中有些罵起娘来，他就說，“媽的，我要真干的。走开。”他們看出了苗头，頃刻之間人群作鳥兽散了，官儿們和州警察当局知道，如果他們准許暴徒襲击我們的話，許多人会遭到杀害，而且其中会有一些白人。

两辆警車护卫着我們离开了那里，一辆在前，一辆在后。这样办还是第一次。有些白人嚷着，“瞧，他們居然保护黑鬼呢！瞧，他們原来是这样把黑鬼从这里带走的！”

由于我們所采取的立場和我們战斗的决心，北卡罗来納州政府維持了法律和秩序。只出动了两名州警察就解决了問題，而且沒有伤一个人。通常(在南方)那得流很多黑人的鮮血。那一年当局封閉了游泳池，因而我們撤退了糾察綫。

这并不是我們 1961 年在門罗城的斗争故事的結束。由于命运的作弄，发生了另一个插曲，这个插曲关系到“自由乘客”和他們的消极抵抗的政策。他們的政策执行的結果和我們的自卫政策执行的結果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这对所有的黑人都是一个生动的客观教訓。但是在我談那个問題之前，我必須先叙述一下我們的自卫政策是怎样发展起来的，門罗城的黑人社会又是怎样終于支持我那个必須“以暴力来对付暴力”的結論的。

这个故事开始在 1955 年，那年我作为美国海軍陆战队的退伍軍人回到了我的故乡門罗，并且参加了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当地的分会。

第二章

一个有色人种协进会分会 在战斗中重生

我的家乡是北卡罗来纳州的門罗城。这个城有一万一千居民，約四分之一是黑人。它是尤宁县县政府的所在地，离南卡罗来纳州边境十四英里。这个地方的精神面貌，与其說接近于人們往往和北卡罗来纳州联系在一起的圣堂山^①的自由气氛，还不如說更接近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气氛。在我們这个城，沒有职工会，而三 K 党在东南区的总部却設在那里。

在我退伍回乡的那个时候，那里还有一个人數不多的、已經气息奄奄的有色人种协进会分会。尤宁县的有色人种协进会是个典型的南方分会，規模小，不活跃，基本上由黑人社会中的上层分子——自由职业者、商人和职员——組成，并且受他們控制。

在 1954 年最高法院关于消除种族隔离的判决以前，有色人种协进会并不是种族隔离分子的首要目标。在南方的許多地方，包括門罗城在內，种族主义者是不太关心小規模的地方分会的。但是最高法院的判决急剧地改变了种族主义者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三 K 党和白人公民委员会开始認真調查附近的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会址，調查負責人是誰，哪些人是會員。他們用武力和經濟制裁来威胁人們，逼迫他們退会。这些分会本来就

① 圣堂山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鎮的名称。——譯者

是規模很小的，这时迅速地衰落下去了。

一个老兵回到了家

当我从海軍陆战队退伍的时候，我一心要回到家乡去参加有色人种协进会。我在海軍里曾經嚐到歧視的味道，几次被关进了班房。我参加有色人种协进会分会的时候，正逢这个分会的會員减少到只有六个人的时候。这个分会的领导建議把分会解散。我反对解散，他們就把我选为主席，然后都退出了分会，只剩下艾伯特·E·佩里博士和我两个人。佩里博士是一个剛在門罗城定居下来的新人，在那里行医很得众望，因此他就当选为我們的副主席。我設法劝說以前的會員回来，但都无效，最后我認識到我只能在沒有本地黑人头面人物参加下进行工作。

那个时候，我是沒有經驗的。我在参加海軍陆战队之前，曾經有一个时期离开过門罗城，在新澤西的一家飞机厂和底特律的一家汽車厂里做工。那时我曾不知不觉地从周圍的活动中得到了一些关于組織起来的想法，只是我从来没有在地方工会中工作过，因而缺少做組織工作的經驗。但是我是一个爱活动的人，不願意在像有色人种协进会那样重要的事情上抱消极态度。

就这样，有一天我走进了城里的一家黑人彈子房，打断了他們的游戏，把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些宣傳品往彈子桌上一放，而且讲了一通。我把那里一半的人都吸收入会。这样我就使我們的分会迈开了新的一步。我們在工人、农民、家庭佣工、失业黑人以及当地的全体黑人中展开了征集會員的运动。結果这个分会变成了一个由工人階級組成的組織，领导分会的也不是中产階級，因而我們把分会变成了整个有色人种协进会中的一个

独特的分会。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分会有英勇坚强、不畏强暴的很多退伍軍人參加。我們在門羅和尤宁县展开了要求在公用事业中实行种族合一的斗争，而且得到了一群信奉单一上帝教的白人的支持。在 1957 年，我們毫无阻碍地在公立图书馆中消除了种族隔离。但是使我們大为吃惊的是，在南方的其他州城，特别是在弗吉尼亚州，黑人为了想在图书馆里实行种族合一而遭到横暴的迫害。

我們进一步为黑人争取更大的权利：经济的权利，教育的权利和在法律面前享受平等保护的权利。我們迅速地获得了我們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中最具战斗性的一个分会的声誉。很显然，如果我們不敢去触怒那些企图阻止美国黑人像美国白人一样享受他們不可剥夺的人权的种族主义者，我們是不能得到这种声誉的。具体說，我們激起了三K党的愤怒，我們和他們在游泳池实行种族合一的問題上展开了一场决战。

三K党采取行动

我已經說过，游泳池是通过公共工程管理局的安排用联邦政府的款項建筑起来的。不管是联邦政府也好，或是地方当局也好，都沒有为黑人提供过什么游泳的设备。在几年的时间内，有好几个我們黑人的孩子在沒有人管理的水沟里游泳而淹死了。当 1956 年我們又死了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們就展开了一个为黑人，特别是为我們黑人孩子們要求游泳设备的运动。

首先，我們請求門羅市当局在黑人居住区中建造一个游泳池。这将会是个种族隔离的池子，但我們还是請求建造这样一个池子，因为我們所关心的只是想为我們黑人的孩子提供一些安全的设备。門羅当局說，他們不能同意我們的这种請求，因为

这太花費了，他們沒有这一笔錢。既然这样，我們为了謀求妥协，就要求他們把那个禁止黑人使用的游泳池每星期空出一两天来供我們的黑人孩子游泳。当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时，他們說这也太花費。我們問他們为什么会太花費呢？他們說，因为每次有色人种用过之后，他們就得把水抽干，重新換水。

他們說，等到他們有了款子，他們会給我們建造一个游泳池的。我們問他們什么时候可以盼到。一年嗎？他們說，不。我們問，五年嗎？他們說，不，他們不能肯定。我們問，十年嗎？他們說不能肯定。我們最后問，我們是否能在十五年內盼到呢？他們說，他們不能給我們任何肯定的許諾。

在黑人居住区里有一个白人天主教傳教士，他有一輛旅行汽車，他願意用車把黑人青年送到离城二十五英里的北卡罗来納州的夏洛特城去，让这些青年在那里的黑人游泳池里游泳。有些夏洛特城的官員看見这个傳教士在一个黑人游泳池里游泳，他們就打听他是誰。游泳池的黑人管理員解釋說，他是个傳教士。这些官員說，他們不管他是不是傳教士，他們只知道他是白人，夏洛特城是实行种族隔离的，因此他們禁止这个傳教士进入这个有色人用的池子。

于是孩子們仍然沒有任何安全的地方去游泳——因此我們决定对門罗游泳池采取法律行动。

第一，我們开展了一个在那里當場立等的运动。我們到那里站一会儿，要求进入，但一直沒有得到許可。当我们这样为今后可能采取的法律手段进行准备工作时，三K党挺身而出。报上开始登載关于三K党的活动的文章。起初，他們提到将有几百个人在空地里集合，举行三K党的大会。以后人数越来越多，一直增加到了三千，四千，五千之多。到最后，据《門罗諮詢报》的統計，有七千五百个三K党徒聚集在一个場地上，討論如

何对付被他們称为“受共产党鼓动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張种族合一的分子。他們开展了一个驅逐我們的运动，要把我們从黑人居住区里撵走，其鋒芒首先針對着我們分会的副主席佩里博士和我。

三K党的这个运动是以散发請願书开始的。为了征集签名，他們在門罗城法院的廣場上摆了一張桌子。請願书說，佩里博士和我應該被永远驅逐出尤宁县，因為我們是“共产党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負責人和成員。三K党揚言他們在第一个星期征集到了三千人的签名。在第二个星期，他們揚言又得到了三千人的签名。他們沒有任何可以采取法律行动的根据，但是他們却希望單純用数目字就把我們吓得离开这个城市。在南方的历史中，在过去的日子里，一个黑人只要知道有这么多人要驅逐他，他就会自己出走的。人們一定記得，在这个居住区里据報紙統計三K党有七千五百个支持者，而全城的人口只不过約一万二千人。事实是，許多三K党徒是从南卡罗来納州来的，門罗城离南卡罗来納州边境不过十四英里。

當他們发现这不能吓倒我們的时候，他們就决定采取直接的行动。在他們的大会以后，他們的汽車队就长驅直入进到我們的居住区里，他們一面按汽車喇叭，一面朝車窗外开枪。他們曾經在一个偏僻的路角抓住了一个黑人妇女，用手枪对准着她，逼她跳舞。

在我們黑人居住区发生这一暴行的时候，一群和平主义的牧师去見了市政当局，要求他們禁止三K党徒組織这些汽車队，列队經過門罗。县和市当局的負責人以三K党是一个合法組織，它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样有宪法賦予的組織权利为理由，拒絕了这些牧师們的請求。

自卫是从我們的苦难中誕生的

既然市政当局不願阻止三 K 党，我們就决定由我們自己来阻止三 K 党。我們的这种行动是出于防卫的需要，因为法律和秩序已遭到破坏；因为門罗城根本没有什么像美国宪法中第十四修正案那样的东西。地方当局拒絕維護法律和秩序，當我們轉而請求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当局出来維護法律和秩序时，他們不是拒絕了我們的請求，就是对我們的請求置之不理。

現任商业部长路德·霍季斯那时是北卡罗来納州的州长。我們最先向他提出了呼吁。他袒护三 K 党的立場，說三 K 党沒有破坏法律，也沒有不守秩序。于是我們又向艾森豪威尔呼吁，但是我們的呼吁从未得到答复。华盛顿方面毫无反应。

所以我們就开始武装自己。我写信給鼓励退伍軍人保持保卫国土的本領的“全国来福枪联合会”，要求批准我們成立分会，我們得到了許可。在一年之內，我們的會員发展到了六十人。我們也买了一些枪枝作为儲备。后来北方的一个教会捐了錢，為我們买了些更好的枪枝。三 K 党看見我們在武装起来保卫我們的居住区。他們在 1957 年的夏天費了很大力气来阻止我們。他們的一个武装汽車队对黑人居住区近郊的佩里博士的住处发动了攻击。我們和三 K 党开枪互射，打退了他們的攻击。这使三 K 党再沒有胃口打这样的仗了。他們停止了对我們居住区的襲击。在这次战斗之后，那些說三 K 党有組織权利的同一个人市政当局举行了一次紧急會議，通过了一項法令，禁止三 K 党不經過警长的特別許可就进入門罗。

在我們和三 K 党发生冲突的时候，只有三家黑人的出版物——《美籍非洲人杂志》，《諾福克指針报》和《黑宝石杂志》——

报道了这件事。《黑宝石杂志》还登了几张自卫队的照片。我们的战斗发生在那一次有名的印第安人和三K党开火事件之前两星期。我们把三K党从我们的城市驱逐到印第安人的居住区。全国的报纸所以乐于那样大事报道印第安人和三K党人的开火事件，是因为他们不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印第安人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因而谁都可以把这件事当作逗乐的玩笑，一笑置之——但是可没有人愿意使黑人得到这样的印象，仿佛这就是他们用以对付三K党的公认的方式。所以白人的报纸对于门罗的战斗采取了严密封锁的手法。

在三K党知道使用暴力不能达到目的后，就利用种族主义的法院。他们控告佩里博士犯了莫须有的堕胎罪。他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医生。有一位曾经担任过县政府卫生局局长的医生从四十英里之外驱车前来替佩里博士作证。他宣布说，当佩里博士在医院里工作的时候，曾经拒绝给县政府福利局开具绝育许可证，因为这是违背他的宗教信仰的。但是佩里却被判有罪，判处了五年徒刑，而且被吊销了行医的执照。

吻 臉 事 件

1958年10月，两个本地的孩子——七岁的大卫·辛普森和九岁的海诺佛·汤普逊以强奸罪被捕，这种罪名在北卡罗来纳州可以判处死刑。

这就是有名的“吻脸事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下午，大卫和海诺佛同几个白人儿童在一起玩一种叫做“牧童和印第安人”的游戏。白人女孩中有一个叫西西·萨顿的坐在海诺佛的膝上，忽然认出了海诺佛是她的老游伴。原来海诺佛的母亲是替西西的母亲做过活的。海诺佛在学龄以前，他的母亲到

薩頓家去做活总是把他帶在身边的。

这个姑娘发现海諾佛是她的老游伴，就在他臉上吻了一下。到了下午，她跑回家去告訴她的母亲說，她怎样見到了海諾佛，又怎样因为能够重新見到他感到很高兴而吻了他。

薩頓夫人听了就緊張得心神不安，她去見了警察当局。两个孩子沒回到家就被捕，并且被关进了監獄。在北卡罗来納州，如果有人因为强奸而遭逮捕，那末在警察当局偵查时期是不准与任何人見面的。据此理由，警察当局沒有通知小孩的家长。

几天之后，我們終于发现了事情的原委和两个失踪孩子的下落，我們就去設法求援。但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却不願与聞此事，因为这是件“桃色案件”。一个七岁的白人女孩吻了一个九岁的黑人男孩的臉，协进会的全国委员会就不願过問了。

孩子在被逮捕后不久，就被送进了感化院。我請了专办公民权利案件的律师康拉德·利恩，于是他从紐約来到了我們这地方。首先，他和判刑的汉普頓·普賴斯法官进行商談。

这位法官对利恩律师說，他曾經举行了一次“单独而平等的审訊”。利恩問他所謂“单独而平等的审訊”是指的什么。法官就告訴他說，那天早上开庭，他把薩頓夫人和她的女儿傳了来，薩頓夫人作了一番陈述之后，她們就被送了回去，到了下午，两个黑孩子的母亲被傳到法官面前，她們的孩子也同时带来了。然后法官对利恩律师說，“我把薩頓夫人告訴我的話轉告了她們，既然孩子們犯了罪，我就把他們送到感化院里去过十四年。”

有色人种协进会全国委员会仍然不願过問这个事件。但是利恩律师的一个朋友，一个英国記者，訪問了感化院，而且暗地里弄出了一張两个孩子合拍的照片，和一則新聞一起在1958年12月15日的倫敦《新聞紀事报》的头版上发表了。就这样，整个欧洲都風聞了这件事。在倫敦、鹿特丹、羅馬和巴黎到处掀起了

示威行动。只是到了那个时候，美国的报纸才开始对“吻脸事件”表示了“关心”。

1958年12月底，佩里博士、康拉德·利恩和我被罗伊·威金斯召到纽约去。他说，如果我愿意离开门罗，他就可以给我在底特律找一个工作。我断然拒绝了他的交易。

到了这个时候，在国外，甚至在美国，压力越来越大，终于使有色人种协进会全国委员会不得不过问这个案件——直到现在为止还是和可怕的两性关系这样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案件。在1月下旬，法庭开了一次审，但是孩子们被送回了感化院。世界的压力增长着。例如荷兰鹿特丹地方一所以罗斯福总统命名的中学的一万五千名学生和教职员签署了一项请愿书，要求释放两个孩子。这封请愿书被送到罗斯福夫人那里。

最后，有人对艾森豪威尔说了些话，他终于又对我们当时的州长霍季斯交代了几句，于是孩子在1959年2月13日被释放了。

“我們要用暴力对付暴力”

1959年，在门罗城旅馆里当女仆的乔治亚·怀特夫人，一位有五个孩子的黑人母亲，被一个白人旅客踢倒，从楼梯上直栽下来，跌到了旅馆的前厅里。他说他把怀特夫人踢下楼梯，是因为她在走廊里工作的时候声音太大了，扰乱了他的睡眠。当我们要求对他提出公诉时，警长曼尼拒绝了我们的请求。我们威胁说要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请来采取法律行动，他才变得温和了一点，让这个白人缴七十五美元保释金。但是，这个白人被告结果并没有出庭受审，他没有被提起公诉。

就是在那一天，另外一个黑人妇女名叫玛丽·鲁思·李德

夫人的，也在法庭里。李德夫人已經怀孕八个月。有一个白人闖进了她的屋子想强奸她沒有成功，就把她从屋子里赶到外边打了一頓。她想往大路上逃走，那个白人就一把揪住她，把她打倒在地上。李德夫人有一个六岁的孩子，跟在她的身边一起奔跑，在这个白人强奸犯毆打他母亲的时候，这孩子撿起一根木条往白人头上打去，他的母亲乘机逃脫了。她跑到了一个邻居的家里，邻居把警察叫来帮她忙。这位邻居是个白人，她在那天和李德夫人一同到法庭去。她作证說，她看見被告追着李德夫人，而且看見李德夫人到她家的时候神色十分慌張，沒有穿鞋，被撕破了衣服。这样的证詞，对李德夫人的白人邻居來說，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

在审訊期間，被告的辯护人安排被告的妻子坐在被告旁边，仿佛她也同这个案子有关似的。然后被告的辯护人向庭上作了申訴。他說，“尊敬的法官先生，陪审的女士和先生們，請你們看看这个男人吧。这是他的妻子。这个女人，这个白种女人是純洁的生命之花。她是上帝創造的珍宝，是一朵純洁的花。你們想一想，这个男人会拋棄这朵純洁之花去找那种女人嗎？”他把事情說得仿佛这个黑种女人倒是在真正受审似的。然后他結束了他的辯护說，“这个問題只是在于你相信这个女人呢，还是你相信这个白种男人。尊敬的法官，这个男人沒有犯什么罪，他只是喝了酒，寻点小小的开心而已。”这个男人就被这样开釋了。

李德夫人有几个兄弟，他們曾經想在审訊开始前杀死这个侮辱她的白人。但是我亲自說服了他們什么也不要干。我說这是一件需要以法律来处理的事情。我还說我們一定找一个律师。我們的確找了。我們从远自紐約的地方把律师請了来，但是他在法庭上甚至不准說一句話。所以这个强奸未遂犯沒有受到懲罰，我是有責任的。

法庭里滿屋子都是黑人妇女。当这个男人被开释时，她們就轉身对我說，“現在你說怎么办？你对我們打开了禍水之門，这些人現在知道他們要把我們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了，法律制裁是沒有指望的，这就是說我們已暴露在这些白人的面前听任他們宰割了，这應該由你負責。現在你还有什么說的呢？”我告訴她們說，在文明的社会里，法律是遏制强者欺侮弱者的一种威懾力量；但是美国的南方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南方是个野兽社会，在那样的情況下，我們必須訴諸野兽的法律，我們有必要創立我們自己的威懾力量。我还說，我們今后要用我們的武器来保卫我們的妇女和子女，我們的家庭和我們自身。我們要用暴力来对付暴力。

我的声明在美国全国到处轉載。我所說的是，“今天的事实表明，美国南方的黑人不能指望在法庭上得到正义，他們必須把犯罪者當場懲办。他們必須用暴力对付暴力，用私刑对付私刑。”

第二天，我在接見《卡罗来納时报》記者时再一次指出得不到法庭保护的事实，我說，“这些法庭的判决为暴力开辟了道路。我并不以为黑人應該跑到街头去為他們所受到的虐待和不平进行报复……。”我在同一天又在辛辛那提广播电台作了这种声明，那天晚上，在夏洛特市的一次电视訪問中，我又一次明白地表示，在法庭不能保护我們时我們就起来自卫。

既然原則是这样地明白无疑，我不能理解我的声明为什么引起了震动，为什么在全国受到那样广泛的傳播。两年以前，當我們开枪反击三K党来进行自卫的时候，美国沒有一家白人的报纸对这事件作了报道。我們只是要大家注意我們还要做更多同样的事情，黑人的自卫将在門罗城坚持下去。所以对我來說，我并不感到我們做了什么新的事情。我現在才認識到，我們那时

是在树立一条原则，这条原则是从我们的经历中得出来的，它能够而且会给别人树立一个榜样。

回头来看，种族主义者宣传我们的立场显然是个大错误。纵然这使我和我的家族受到了很大的痛苦，但其结果却迫使他们不能不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一场辩论，而且这还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胆怯态度，迫使协进会终于再一次正式肯定黑人对种族主义者的暴行有实行自卫的权利。

第三章

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 战斗性而斗争

在我的声明震动了全国性的报纸以前，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全国委员会对我们并不怎么重视。在我们的斗争中和我们需要的时刻，我们很少得到过他们的什么帮助。现在他们却刻不容缓起来。就在第二天早晨，我接到了全国委员会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希望知道我的声明是不是被准确地引用了。我告诉他们是被准确地引用了。他们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并不是一个暴力组织。我解释说，我知道它不是一个暴力组织。于是，他们说，我发表了暴力性的声明。我回答说，我是以罗伯特·威廉的名义发表声明的，不是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名义发表的。他们说，正由于我是这个组织的一个负责人，我说的任何话都会被认为就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政策，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我问他们，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真的这样密切，那么当我由于三K党的经济压力而成为一个失业的牺牲者的时候，当我被保险公司认为风险太大而被取消了所有的保险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来营救我。我问他们，为什么那时候他们就不考虑考虑我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停职，歪曲和重选

几小时以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威金斯就停止

了我的职务。这件事我并不是从全国委员会知道的。我是从南方广播电台的广播中才第一次听说我被停职了。广播每隔半小时就重复一次，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已经由于我鼓吹暴力而停止了我的职务，因为暴力不是解决种族问题的一种手段，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是反对黑人把暴力当作自卫手段的。

我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尤宁县分会是南方少数的种族混合的分会之一。我们的会员中有一些白人和平主义者。当我被停职以后，他们打电报给全国委员会，说明他们是白色的南方人，是和平主义者，但是他们抗议我被停职，理由是，他们了解这个居民区中的问题，而全国委员会并不了解。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个电报。也从来没有一份报纸报道过我们的分会是一个种族混合的分会，甚至南方的白人和平主义者也支持我的立场。

尽管如此，这个问题还是发展成了全国性的辩论。我们发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会章中沒有一条是可以为罗·威金斯的虚伪行为辩护或是授权他这样作的。我要求举行一次意见听取会。威金斯把这件事情交给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直属的分会委员会，他们在1959年6月3日在纽约举行了一次变成为对我进行审讯的听证会，在这次会上我就停职问题进行了斗争。这个委员会判决我停职六个月，六个月以后，我可自动恢复原职。

关于停职问题，我不想再纠缠下去了；因为我面前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由于审讯的结果，我更加深信我们最重大和最迫切的需要之一是进一步改善我们本种族的内部联系。真正的美国黑人的斗争只是一个相互脱节的反抗网而已，更令人感到羞惭的是，黑人依赖白人提供的不准确的报道作为他们获得这些孤立的斗争的消息源泉。我回到家乡，集中精力办了一个通讯，这个通讯将把在美国发生的美国黑人的解放斗争和我们在门罗

城經常进行的詳細斗争情况，准确地和毫不含糊地告诉黑人和白人。第一期《十字軍战士报》于1959年6月26日用油印机印出来了。

接着，我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第五十届全国大会快要举行的最后时刻，我决定请求把委员会的决议提交7月在纽约召开的这届全国大会。全国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由大会散发一个专门的小册子来攻击我。他们的小册子说，我们主张黑人以暴力对付暴力作为自卫手段就是鼓吹使用私刑手段，企图把两者混为一谈。这样全国委员会就助长了种族主义报纸所渲染的错误印象：我鼓动种族战争和不分青红皂白屠杀白人。

大会的代表们表示支持给予我的停职处分，因为有很多代表或是意识到或是被迫地把这次投票看作是公开支持还是公开反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全国领导问题，但是在当前实质性的问题上，代表的情绪迫使全国领导支持了自卫的观念。大会通过的决议前言说：“……我们不否认，而且再次肯定个人和集体对非法的暴力有自卫的权利。”

我被停职期间，我们分会的会员们选举我的妻子代替我当主席。六个月以后，我并没有自动地恢复原职，我举行了一次选举，因为我不愿意让有色人种协进会全国委员会认为他们对我还有什么照顾。我们进行了选举，我被一致通过，重新当选。

有色人种协进会全国委员会一心要向一些有影响的北方白人讨好。这些人都是对我们的战斗精神感到头痛的。他们对我们的分会保持冷淡态度。我们只有一份他们发给的批准成立分会的证书，其他什么也没有了。在我们的黑白人合校事件和入座示威事件中，我们没有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帮助。

1960年，我们发动了一次入座运动。我们成为北卡罗来纳州发动入座示威的第十三个城市。虽然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并

沒有重視这次斗争，但是我們的入座示威說明了自卫和非暴力能够很好地結合起来。門罗的入座示威比起南方的其他人座示威来，暴力事件更少。在別的地方，有的黑人被打破了头，但是在我們的入座示威中，甚至連一个示威者被人啐口水的事都沒有发生过。我們的示威所以沒有出現什么暴力，是因为我們已經显示出我們有保卫自己的决心和准备。我們在門罗的大街上，不是以仰賴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怜悯和施舍过活的乞丐身份出現的，我們是以有力量的人民的身分出現的，維持和平的关系对有关各方相互間都有好处。

当示威正在进行的时候，我被捕了，最后我被判服苦役三十天。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應該来处理我的案件。他們把我的案件上呈到州最高法院，但是接着在离截止提出申訴只有几天的时候他們不告訴我就对我的案件撤銷了上訴。我是从報紙上发现这件事情的，因为我的案件是和北卡罗来納州圣堂山的七名学生案件連在一起的。報紙上列举了曾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提出上訴的被告人名单，在这个名单上，唯独沒有我的名字。我向紧急公民权利委员会提出了申請，他們受理了我的案件，并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訴。

* * *

“一封‘大亨’的来信”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沒有接到过什么劝告。他們一面认为他們沒有責任向更高一級的法院就我的案件提出上訴，但同时，当1960年夏天我从古巴回来的时候，他們却认为有責任寄給我一封信。我接着又到古巴訪問过两次。

我在門罗的經驗和我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打交道的經驗

使我终于创办了《十字军战士报》，这些经验同时也使我更加了解了世界各地的黑人斗争，他们的遭遇，他们的胜利和失败。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古巴的黑人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构成了古巴革命的一部分，我的访问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有一个黑人就成了古巴军队的领导人。这是在美国任何人也无法对我们掩盖的事实。对我来说，这次革命才是一次真正的革命，而不是一次虚伪的南美宫廷革命。有一股真正的推动力量把社会正义带给所有的古巴人，其中也包括黑人。从1959年年末起，我就开始在《十字军战士报》上发表报道古巴实况的文章，指出那里存在着种族平等。这些文章似乎惊动了全国委员会，他们写给我一封信，其中有这类的话：

“……但是我怀疑你是不是充分地认识到了你似乎乐于采取的那种行动的危險性和害处。近几个月来，我一直密切地注意着古巴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今年秋天卡斯特罗博士对联合国的访问。不管古巴的事业有什么价值，我对那种经常的不诚实的表现感到十分不安。我相信，在你发现你自己在古巴和我国目前的不幸争执中被用作别人的走卒以前，这种不诚实的表现是值得你深思的。

“……这是对于美国国内问题的一种蛮横的干涉，担任美国黑人运动中领导职位的任何一个负责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认识。

“……目前古巴要讨好美国黑人是明显地出之于一种不良的动机。（我要问你，美国黑人旅行者在古巴听到不断地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口号时作何感想。）

“……你难道愿意放弃在我国也同样反对压制黑人权利的那部分人的重要支持吗？

“……难道伟大的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不幸事例还没有使你认识到，你似乎正要选择的道路是危险的和错误

的嗎？保罗·罗伯逊尽管有他的偉大之处，但是在目前为爭取平等的斗争中，他到底为美国黑人作了些什么呢？很遺憾，答案只能是这样：一事无成。”

摘引的这些話都在《十字軍战士报》上发表了，我对这些話的答复是这样的：

“只有白痴和唯利是图的伪君子才能厚着臉皮說，这样一个国家和它的偉大領袖在对待北美被奴役的黑人中是不誠实的，因为他們在日常活动中充分地表現了目前世界上最大限度的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社会正义必須从国内开始，然后再推广到国外，这是最簡單明白的道理。在过去几个月，我曾两次訪問古巴，在那里，使我感觉到我是一生中第一次成为人类的一員，这没有什么不誠实可言。如果这是美国观念中的不誠实，那么但愿上帝也能使美国变成像菲德尔·卡斯特罗和自由古巴那样不誠实地赋予非洲血統的人民以进入人类行列的权利吧。

“至于說我在古巴反对北美帝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斗争中‘充当了走卒’，那末我宁願站在正义的一边，而不願站在歧視和迫害黑人的一边。我宁願充当一个傳播尊重人权的人民的真理的工具，而不願充当一个为迫害和歧視黑人塗脂抹粉的湯姆叔叔^①和一个为美国伪善行为辯护的人。古巴憎恨美国对人的不人道行为，并不是对‘美国国内問題’的干涉。‘自由世界’的統治民族极力对外輸出北美制造的种族主义，这是人人皆知的。美国的种族主义是同納粹主义一样的世界問題。如果美国可以成为唯一的一个違反了联合国人权宪章而不受制裁的国家，那么，联合国这个堂而皇之的組織也就成了压迫美国被奴役人民这一严重罪行的参加者了。拿我來說，我就不能对企图毀

① 湯姆叔叔是斯陀夫人所著《黑奴吁天录》一书中的主人翁，一个逆来順受的老黑奴。——譯者

掉我的那股势力保持沉默和采取合作的态度。

“美国的种族主义者是地球上最残暴的人，如果被压迫的美国黑人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个生死攸关的斗争看成是自己家里的事，那就太愚蠢了。我们是受压迫的，当然我们要把我们的疾苦向国内国外申诉。美国的种族斗争不仅不是一个只有美国人参加的斗争，更不是一个只是黑人为了黑人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目前世界上任何一种争取自由的斗争都必然会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稳定。你怎么能把我们的斗争看成是例外呢？”

“我并不怕疏远我们解放运动中的白人朋友。如果他们真正相信自由，他们就不会对我们脱离曾把我们引入迷宫的老路有所不满。如果他们是不诚恳的，那么他们不过就像钻进我们队伍里的特洛伊木马一样，站在他们曾经假装憎恨的事物的一边，阴险而恶毒地打击我们而已。如果他们不愿意我们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就会因为我们没有进入他们的迷途和陷阱而憎恨我们，这些迷途和陷阱是他们为了阻止我们达到预定的目的地而设计出来的。他们畅谈容忍，但是他们对那些不愿充当他们的傀儡和唯唯诺诺的汤姆叔叔的美洲黑人，却表现出了极度的不能容忍。

“你问我，一个美国黑人旅行者在古巴听到不断地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口号时作何感想，这真有点奇怪。没有人问过我，当你经常遇到‘只限白人’的标记时你有什么感想。这些标记的意思就是‘要白人，不要有色人！’没有人问过我，当你看到黑人由于坐了一下‘只限白人’坐的板凳而被警察当作重犯从大街上拖到监狱里去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当我听到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口号时，联想到我在美国压迫下度过的一生，我深受感动地参加了这个解放的大合唱。我知道这口号并不适用于我，因为‘自由世界’的白人基督徒早已把我排斥在一切‘美国

的’东西以外。

“当你不能对偉大的保罗·罗伯逊为美国‘黑人’的斗争所作的伟大贡献给予正确评价的时候，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保罗·罗伯逊生动地证明了美洲黑人没有必要把美国看成是‘黑鬼天堂’和我们在地球上的最后的安身立命之地。保罗·罗伯逊生动地证明了别的文明社会为了‘自由美国’加以咒骂、迫害和仇视的事情而赞扬和尊重黑人。保罗·罗伯逊已经证明所有的黑人都不是可以拿三十块银币收买的那种人。他已经点起了一支为新的一代照亮道路的火烛。

“是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要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是整个种族所关心的问题。我的事业和亚洲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事业是一致的，是和非洲人反对白种野蛮人的事业一致的，是和古巴反对白人至上的帝国主义的事业一致的。只有我在人类正义的基础上进入美国生活的主流以后，我才能看到团结一致反对外来干涉的共同事业有实现的可能性。”

*

*

*

我不要给人留下一个印象，好像我是反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正好相反，我认为这是争取自由斗争的一个重要武器，而且我还要设法加强它。我认为当我们自己国内有一大堆值得担忧的东西时，他们不应该为古巴的事情而忧虑。他们和我一样地清楚，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对我們请求帮助和保护的呼吁漠视到什么程度。

弄虚作假和花言巧语

我前面已经说过，当我们封闭了游泳池以后，門罗的种族主义者更加疯狂了。就在同一天，我们回家以后，一个暴徒把一个

黑人从他的汽車中拖出来，拉到树林里。他們打他，把他捆在树上，威胁着要枪毙他。我通知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这个人被綁架了，我也通知了司法部。很明显，正当这些暴徒們准备开枪打他的时候，警长出現了，并且救了他。警长怎么会知道他能在树林里找到他呢？事后这个黑人虽然认出了一些企图使用私刑的暴徒，但是他居然不能对那些毆打了他的任何人起訴。联邦調查局拒绝对这次綁架提出起訴。

种族主义者經常夜間出現在黑人居住区，鳴枪鬧事，我們有几次开枪还击。一天夜里，他們在一个州国民警卫軍的尉官的指揮下向我的住宅发动了一次武装襲击。这个尉官被认出来了，但是沒有受到任何制裁，警长根本否认曾經发生了枪击。我們向联邦政府提出了控告。当时每天夜里大約需要二十个自願者担任警卫——这些人自願睡在我的家里担任警卫。这是防止种族主义者攻击的唯一的办法。電話鈴时刻响着，有时候每隔十五分就有一次威胁我的電話。

后来我通过我的通訊《十字軍战士报》，呼吁各地讀者向美国政府，向美国司法部，抗議在門罗沒有实行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抗議地方官吏、联邦調查局夏洛特地方分局和北卡罗来納州的州长阴谋不让門罗的黑人享受宪法赋予他們的权利。

《十字軍战士报》的一位讀者写信給代表康內提克州的国會議員考瓦爾斯基，这个議員又写信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他說，当他知道門罗发生的非法事件以后，他十分驚訝。他說，正当美国自称是世界上民主的卫士的时候，这将給我們的国家带来多么大的損失。这位国會議員要求进行調查。但是美国司法部不顾各地寄給它的所有信件和电报，竟沒有进行調查。他們所作的唯一調查就是問了一問我們的警长这些事情是否屬实，警长向他們保证，这些都不是事实。

最后，我到联邦調查局夏洛特分局，向他們提交了一份长篇报告，要求对警长不让居民享受第十四修正案赋予他們的权利一事，由联邦政府提出公訴。报告虽然送去，但是联邦調查局并没有給我任何答复。不久，有一位記者告訴我，他从司法部听到他們曾声称他們沒有在門罗找到任何違反第十四修正案的证据。他們本来就不打算答复我。

在这个时候我又接到美国国务院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們剥夺了我和我的家屬到古巴去旅行的权利。古巴曾邀請我們去参加“七·二六”庆祝会。他們拒絕我的理由是，“因为美国和古巴的外交关系断絕了，美国政府对訪問古巴的美国公民无法采取正常的保卫措施。”

这种假装关心保护我的安全的借口是天大的胡說八道和典型的弄虛作假行为。在前三个星期当中，我的生命就已經受到过无数次的威胁和四次謀害，那些受到地方官員支持和鼓动的謀杀未遂的凶手，由于联邦政府官員有意識地对他們保持沉默而得以逍遙法外，这些联邦政府的官員也就是我曾經不断地向他們要求采取“正常的保卫措施”的那些人。联邦政府絲毫也不关心保护我和家屬的安全，因为他們在国内已错过了很多保卫我的机会。

以上这些事情都是在我被迫离开門罗的前一个月发生的。

第四章

非暴力助长了种族主义者 的气焰：恐怖的一周

在我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分会中，有一种普遍的感觉：我们在进行着一场深刻、激烈的反对种族主义者的斗争，我们需要尽可能地使更多的黑人参加进来，尽可能地使这一斗争更富有意义。我们感到，单单一个游泳池的问题对我们的需要来说未免太狭窄了，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特别注重职业、福利和其他经济要求的广泛纲领。

我认为这是向前迈了重要的一步。“自由乘客”和入座示威运动的斗争已经集中到一个单一的目标上：在便餐台吃饭的权利，在公共汽车里随便入座的权利。这些都是重要的权利，他们不给黑人这些权利就是对黑人个人尊严的直接侵犯。对种族主义者来说，保持这些种族隔离的表面形式是重要的，这创造了支持这种制度的气氛。他们所以这样地和一些个人的小事情上贬低和挫伤黑人，其目的就是要侵蚀黑人的尊严和荣誉，而这种尊严和荣誉是向种族主义制度进行挑战所必须的。但是种族主义的基本核心不止在于气氛而已，这种核心可以用金钱和失业的百分比来衡量。所以我们决定提出一个包括游泳池和工作问题都在内的纲领。

門 罗 綱 領

1961年8月15日，我代表我们的分会向門罗市議會提出

了一个十点綱領，內容如下：

請 願 書

我們，簽字的門羅公民，請求市議會運用其影響努力作到：

1. 勸導本縣的工廠招收工人時不加歧視。
2. 勸導地方就業機構給予非白人与白人同样的权利。
2. 指示福利機構給予非白人与白人同样的权利、照顧和关怀。
4. 在門羅溫契斯特大街建築一个游泳池。
5. 清除一切把門羅划分为有色人种和白色人种地区的标志。
6. 指示总学監至迟在 1962 年必須准备在市立学校中消除种族隔离。
7. 为所有在校儿童提供足够的交通工具。
8. 正式請求州衛生局允許艾伯特·E·佩里博士在門羅和本县行医。
9. 市政府任用黑人担任技术和管理工做。
10. **立即实行**以上所有的建議，并把你們的行动通知委员会和公众。

(簽字)

罗伯特·F·威廉

艾伯特·E·佩里医学博士

約翰·W·麥克道

我們要求享有同等的就業权利是十点綱領中最重要的一項。当时有很多工厂从北方迁来，——这些企业是为了躲避工会和在南方寻找廉价劳动力从北方逃来的。他們从当地工业发展委员会接受了数目可观的減稅优待，但他們不雇用黑人。事实上，頑固不化的地方官吏曾經充分地运用他們的职权来阻撓黑人就業。他們甚至作出了这样的規定，凡是新的企业都不得雇用黑人，否則他們就不能享受特別的減稅优待，而这种优待是通过向我們所有的人抽稅才有可能的。这等于随便納稅，这是我們最不滿的一点。

执行这种种族主义政策的結果，在大約三千个門羅的美洲

黑人中就有一千个失业者——这些人甚至连个看門人、女仆或搬运工人的工作都找不到。即使找到当女仆或搬运工人的工作，每星期工作六天，最多也不过赚十五块钱。摘棉花是可能找到的少数工作之一，每摘一百磅棉花才给两块五毛钱，要拚着命摘一整天，远远超过八小时，才能摘一百五十磅。实际上，門罗的每个中学和大学里的黑人毕业生都只好到外地去找工作。白人毕业生就不必这样。黑人甚至于每逢夏天就要被解雇，以便白人青年大学生可以在本地找到工作。每年的夏天在我們的大街上聚集着很多刚离开学校的黑人青年。他们既得不到足以糊口的工作又得不到有益的文娱活动。

由于上述的这些原因，我们相信基本的病症是一种经济病，我們被剥夺了享有可以糊口的生活水平的权利。

“自由乘客”来到了門罗

我們曾计划在县法院四周組織一条糾察綫，以便引起他們對我們綱領的注意，迫使他們實現这个綱領。在这个时候，有十七位“自由乘客”前来支持我們的斗争，这恐怕是他們第一次参加为了爭取實現我們綱領中提出的那样具有根本性的要求所进行的斗争。在此以前，就像我已說过的那样，我們的目標虽然重要但終究是表面文章，容易滿足于細小的妥協。例如，我們曾經贏得了在公立圖書館实行种族合一。在这些表面事情上，入座示威运动的領導人是能够同市和州的当局打交道并且获得一些让步的。我相信这是整个黑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当这些让步被黑人“領袖們”当作据说美洲黑人正在取得的惊人进步的事例来进行宣傳，因而轉移了对根本的症結的注意力的时候，那么，这些胜利就連表面文章也說不上了，它們变成了自找失敗。但

是当我们认真解决根本的症结的时候，种族主义者是寸步不让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到門罗来的“自由乘客”遇到了这样赤裸裸的暴力和残酷的原因。同时，也是由于他们作了非暴力的保证。

“自由乘客”反映了某些黑人领袖们的态度，他们说：全是我把事情搞坏了，他们将教会我们如何不用暴力来取得胜利。馬丁·路德·金牧师派保罗·布魯克斯牧师和他们一起来，充当“自由乘客”的“智囊”；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将同居民区合作，帮助这个区的黑人发展非暴力的技术和战术。我虽然不同意他们的立场，但是愿意同他们合作。居民区给他们租了一幢房子，为了对他们表示敬意，这幢房子被命名为《自由之家》。我们有一些在上一个月里参加过游泳池糾察綫的英勇的青年参加了他们的活动。他们共同组成了門罗非暴力行动委员会。

虽然我自己拒绝参加非暴力宣誓，但是我要求居民区的人民支持他们和他们的非暴力斗争。門罗的学生参加了非暴力宣誓，答应遵守非暴力纪律，这种纪律和其他一些原则都禁止进行自卫。我还声明，如果他们能够让我看到用非暴力的方法可以从种族主义者那里取得什么成果，我也愿意变成一个和平主义者。

同时，有几个来門罗参观的人，他们要亲眼看看尤宁县的所谓民主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生活在我国其他地方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很难相信，在美国，特别是在像北卡罗来納这样一个被认为是“进步”的南方州，种族主义这样猖獗，存在这样的野蛮和残暴。因此，我们鼓励这些人来访问。美洲黑人青年作家和門罗的老朋友朱利安·梅菲尔德来到了这里。一位从英国达腊姆城来的年轻的交换留学生康斯坦斯·李維尔到我家作客，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梅·馬洛里夫人（她曾经积极主张在她自己所居住的紐約城实行真正的种族合一）。

在門罗非暴力行动委员会組成糾察綫的第一天，“自由乘客”似乎深信他們正在取得真正的进展。一位剛从糾察綫上回来的“自由乘客”非常兴奋。他說，“你看，今天我在城里参加糾察的时候，有一个警察对着我微笑。”我大笑，并且告訴他不要重視那件事，因为那个警察也可能是为了在想怎么用最好的办法杀死他而微笑的。康斯坦斯这位英国交換留学生，参加了糾察，她說，“哦，我认为这些人并不那么坏，我想你可能是不知道怎么样和他們相交。我今天在城里注意到他們是以友好的眼光来看我的。”我对她解釋說，这些人由于期望她和其他的人离开門罗，所以試圖把她和其他的人爭取过去。当这些人理解到他們不能把“自由乘客”爭取过去的时候，那么他們的本性就要表現出来了。几天以后，康斯坦斯·李維尔被門罗警察逮捕了；她被控告“煽动暴乱”。

种族主义者是用暴力行事的

到第三天，一些市民开始对参加糾察綫的人員进行侮辱，他們的彬彬有礼变成了惨无人道。一个警察把一位糾察人員打倒在地上，并威胁着要搗毀他的照像机。还有一位糾察人員被逮捕了。白人群众一直在叫罵；当一位白人“自由乘客”对叫罵的人报以笑容的时候，两个門罗的“純粹的白人之花”向他的臉上吐唾沫。形势越来越緊張了。

第四天，一位白人“自由乘客”在城里的大街上受到攻击，被三个白人毆打。警察把他們驅散了，并且答应逮捕曾經攻击这位“自由乘客”的白人。于是，“自由乘客”认为有可能法律会保护他們，因为他們曾公开声明他們自己是非暴力主义者。我告訴他們，他們是和平主义者，这倒是沒有什么，但是他們不應該

向全世界宣布这一点，因为那样会招致全面的暴力攻击。在过去，我們没有任何人成为他們开始體驗到的这种暴力行为的牺牲品，因為我們事先就显示出了战斗的决心。我們也曾經組織过糾察綫和入座示威，沒有人會成功地攻击过我們的糾察綫。但是，他們說他們的斗争是从道德观点出发的。

星期五，一位白人“自由战士”在参加糾察綫时，被高压汽枪击中了肚子。这件事正好发生在警察的眼前。那一天，市里向糾察綫喷射杀虫水，希望能把学生驅离糾察綫。同时，市里通过了一条特别法令，命令参加糾察的人員要经常保持十五英尺的距离。他們必須保持这样一个距离；他們既不能离得太近，也不能离得太远。然后警察就开始使用这样的策略：他們先让一位糾察人員停止前进，当后边的一个人繼續走过来的时候，他們就逮捕他，說他在別人后面离得太近了。也是在同一天下午，一个十岁的黑人儿童在城里受到三个白人的攻击，因為他們會看到他参加了糾察綫。沒有一个攻击者遭到逮捕。

“你还没有死嗎？”

那一天晚上，“自由乘客”乘車越界到麦克林伯格县去，他們在一个飯店里歇脚。他們被人认出来了，并且受到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攻击。在混战的时候，一个“自由乘客”不得不跑到树林里去躲避；別的人乘車逃跑了，把他一个人丢下了。我們通知門罗警察局、我們县的警察局、夏洛特警察局和麦克林伯格警察局，有一个“自由乘客”在树林里迷失了，种族主义者正要捉拿他。我們恐怕他要受到私刑。我們要求他們出来制止这件事，門罗警察局拒絕了，尤宁县的警察局也拒絕了。

布魯克斯牧師訪問了州長辦公室，據說州長特里·桑福德不在，但是布魯克斯牧師得到了一個同州長第一助理休·B·坎農談話的機會。他向坎農訴苦說，“自由乘客”得不到警察的保護。州長助理卻談論起羅伯特·威廉來了。布魯克斯牧師說他不是來談羅伯特·威廉的，他是來談一個失蹤的“自由乘客”的。他說他們是和平主義者；他們是非暴力主義者，他們要求警察的保護。這位州長助理休·B·坎農說：“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和平主義者，你最好從門羅滾出去，因為那里就要發生大量的暴力行動。”

布魯克斯牧師一再試圖向他請求警察保護，但是他終於放棄了。他說：“你談論了這麼多關於羅伯特·威廉的事情，他就在这里。你要找他談話嗎？”這位州長助理說，正是如此。

我們在兩個星期以前就談過話，當時我要求州的警察保護。州長派了一位名叫拉金斯博士的湯姆叔叔式的人物充當談判的代表，這個人被認為是州長的智囊，他來到後和我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討論用什麼辦法把事情平息下去。我把十點綱領交給他，這個綱領使他很震驚。他說，這個綱領包括得太廣了，要求太高了，但是不管怎麼樣，他將把綱領交給州長。他還說，他了解我一直受到經濟壓力，這很不好。只要我們不再在這一地帶鬧事，我就可能找到一個工作，州里可能幫助我。

當我回訪州長辦公室，並且把這個收買的陰謀告訴休·B·坎農的時候，他回答說：“你的意思是要告訴我，你還沒有死嗎？”我告訴他“沒有，我沒有死，還沒有死，但是假如我要死的話，一大群人將和我一起死。”他說：“哼，你現在沒有死，可是你就要被人殺死的。”我告訴他，為了避免流血事件，我們要求保護。他說：“假如你要想避免流血，你就不應該鼓動鬧事。”

州长和联邦調查局

就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当保罗·布鲁克斯牧师和休·B·坎农谈完话以后，坎农说他要找我谈谈，我接过电话，将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你看，你正在自作自受。你要求暴力，现在就让你得到暴力。”我告诉他，我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才向他呼吁的，我是为了一个和平主义者才向他呼吁的。我并且告诉他，“我也不是为了一个黑人向他呼吁的，我向他呼吁，是由于一个白人青年在树林里失踪了。”他说，“我不管他是谁，你主张暴力，现在就让你得到暴力；你正在自作自受。”我告诉他，“你知道吗？……你是全世界最大的傻瓜！”他恼火起来，开始在电话里大骂，他要我闭嘴。我告诉他，他虽然是州长助理，但是他不能命令我闭嘴。他说：“假如你还这样对我讲话，我就要挂电话了。”后来他还是挂断了电话，没有给我们任何保护。

每当“自由乘客”准备组织纠察线的时候，他们就到夏洛特联邦调查局去请求保护。联邦调查局总是说，“我们这就去。”但是出事的时候，他们从不在场。星期六，当“自由乘客”正在城里纠察的时候，曾经运送他们到纠察线去的出租汽车准备把他们载回来，但当地的白人种族主义者集合起来堵住了去路。这就意味着“自由乘客”必须走回离此将近一英里远的黑人居住区。暴徒沿街追逐着“自由乘客”，用石子扔他们，并且威胁着要杀害他们。当他们进入了黑人居住区以后，没有参加纠察线的黑人骚动起来。他们对那一群追逐“自由乘客”的暴徒侵入我们的居住区感到非常恼怒。很多黑人用石头扔他们的汽车，就这样把白人种族主义者打了回去。

第五章

自卫防止了屠杀：种族主义者 制造的綁架騙局

星期天早晨，警长和他的部下坐着汽車到各处去，号召本县的白种人到城里去毆打“自由乘客”。此外，还有人从别的县和南卡罗来納州赶来。有一个名叫“义勇队”的团体也把人带进了城来。

到下午，数以千計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来到城里，聚集在法院的廣場上。到了四点钟，一位糾察队长詹姆士·富尔曼跑到我家里来，要求我在一个钟头內派出四辆出租汽車。他說种族主义者正在揚言向糾察綫进攻，他还抱怨警察当局对此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在一小时之后，富尔曼的头被打破了，而且被关进了牢房。

在四点三十分的时候，黑人出租汽車公司打电话报告我說，車輛无法开到糾察綫去，因为通向城里的每一个路口都被封鎖了。几分钟以后，由我們的人駕駛的两輛車飞快地赶到我們的住区，他們是剛从城里設法赶来报告情况的。他們說暴徒已經向糾察綫发动攻击，已經开了枪，城里已处在大混乱之中。

到这时为止仍站在法院廣場远处的自卫队，一听到“自由乘客”們和当地非暴力主义青年們的生命处于危險之中，立即跳进他們的車子，突破了暴徒的封鎖綫，直往城里駛去拯救糾察人員。同他們一起去的是朱利安·梅菲尔德。

白人暴徒早已武装起来。可是警察却解除了要想去搭救

“自由乘客”的某些人的武装，并且把这些武器轉交給暴徒。那位英籍交換留學生想進入由三個武裝黑人駕駛的一輛前去搭救的汽車，警察和暴徒企圖加以阻攔，于是在糾察綫爆發了戰鬥。警察扭住了黑人，讓白人種族主義者毆打他們。開始，挨打的都是“自由乘客”和當地主張非暴力的學生，但是很快全城的暴徒都被煽動起來，黑人不分皂白地遭到毆擊。暴徒正在集結起來對我們的黑人居住區發動進攻。

我們的目的是为了自卫

許許多多的“自由乘客”和黑人被逮捕了。為了騰出地方來拘押他們，許多應該依法論罪的人却被從牢里放了出來。他們當中很多人告訴我，被拘留的學生們在牢里流血，有生命危險而得不到任何醫療。我打電話給警長，告訴他有人向我報告學生們在牢里得不到醫療，而且他們的生命在危險中。我告訴他，他必須在三十分鐘內讓學生們得到醫療。如果在三十分鐘內這些學生仍得不到醫療，我們將向牢房發動進軍。大約在十五分鐘之後，詹姆士·富爾曼從醫院里打電話告訴我，他們得到了醫療。緊接着，朱利安·梅菲爾德回來了；他報告說，白人暴徒，還有一些武裝警察，正在鐵路綫附近對着逃出城來的黑人開槍。天快黑的時候，白種人驅車經過我們的居住區，他們大叫大嚷，有些人還從車里往外放槍，用東西投擲街上的人群。許多黑人開始武裝起來，相互交換槍枝和商借彈藥，組成值夜的衛隊來防止正在城里集結的暴徒的襲擊。在我居住的那個街區，有三百個人在街上四出巡邏。

傍晚大約六點鐘的時候，白人布魯斯·史鐵格耳夫婦來到我們的街區。人們認得，史鐵格耳夫婦就是昨天坐着汽車到城

里去的，車上還挂了一面种族主义者的旗帜。旗帜上写着一句口号：“猎黑季节”，意思就是说，这正是屠杀黑人的大好时刻。

人們曾經問，为什么一个种族主义者要在那个星期天把他的妻子帶到我們那个十分混乱的居住区来呢？但是对那些熟知三K党的襲击性质的人來說，这并不稀奇。許多南方的种族主义分子把白人妇女看作是一种保險方式，因为按照古老的傳說，一个黑人是應該会被一个白人妇女吓倒的，是不敢冒犯她的。白人在进行三K党式的襲击的时候，总把妇女帶在一起，因为那样就可以在事态到了发生战斗的时候，让人看到是黑人侮辱了妇女，三K党徒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妇女們的保护人了。史铁格耳夫人就是这样被她丈夫帶在一起作为保險物的。他們想来看看那天夜里我們在怎样准备防御。

在街头巡邏的黑人咆哮起来了。他們中間有些人在城里挨过打。他們的孩子有一些失踪了，有一些被关进了牢房。史铁格耳的車子一进我們的街头，就被认了出来，在我們枪口的威逼下，在离我的住所不到一条街的地方被逼停了下来。我那时正在屋里接听来自全城各个地方的电话：有的是家长要找参加这次示威的子女的；有的是黑人报告他們挨打的情况，問我有什么办法、該采取什么行动的；有的是黑人自願参加战斗，表示願意参加武装队伍来保卫我們居住区的。当我听完了电话以后，我就到我的屋子后面去，准备把防御綫在天黑以前建立起来。

当史铁格耳夫妇被拦住以后，他們被人們从車里拖了出来，并被帶到我的院子里。有人叫我出屋子去。我走到房外，看見一大群人圍在史铁格耳夫妇周圍。我看到这些人是多么憤怒，我又看到史铁格耳夫妇周圍的人群正在越縮越攏。我知道只要有一个人失去了控制，史铁格耳夫妇就会被杀。我把人群从史铁格耳夫妇四面赶开去，強迫他們退到接触不到的地方。

史铁格耳夫人說，“我們已被綁架了！”她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我說，“女士，你并没有被綁架。如果你願意，你随时都可以离开这里，但是你必须穿过这些人群，这些人是发怒了。”她站起来望望人群，說：“你应该把我們从这个地方带开。你能够把我們带出去。如果你带我們离开这里，他們就不会为难我們了。”我說，“女士，我并没有把你带到这里来，我也不会带你离开这里。你們本来知道这些人都是会在这里的；你們知道城里发生了什么样的騷乱，而且你們应该知道这里的人們被激怒到这种地步，最好还是不来为妙。我們現在正忙于保卫我們的家庭。我正在設法建立一道防綫，沒有时间来和你糾纏。那是你的事。”

我們站在那里讲话的时候，在我們头上飞过了一架飞机。这架飞机如果不是三 K 党所派，那就是保安执行部派来的。他們經常使用輕型飞机，而且我們經常接到电话威胁我們，說要从空中来襲击我們，因为我住的房子防卫得太好了，他們无法从地上得到我。所以当这架飞机在我住的屋子上空盘旋的时候，大約有十五个配备着 .30 口徑的远射程来福枪的人对准飞机开了火。史铁格耳夫人曾經十分憤怒和傲慢，但是她一看见这种情景，就認識到情况是多么严重；这些人已經被激怒，真会說干就干的。她渾身发抖，几乎变成了神經质的。那时正好有一辆坐着白人的汽車路过，而且还放着枪，大約有二十个人开枪回击了，你能够看到子彈击中汽車发出的火星。这一点史铁格耳夫人是能够看見的。

我轉身向屋里走去。人群嚷叫着要把史铁格耳夫妇处死。当我跨上前阶时，史铁格耳夫人紧靠着我的身体走着，她的丈夫則紧挨着她。他們跟我一起进了屋，但是所有的人群仍在嚷叫着要把他們处死；有一个人还恳求別人給他一枝枪，并且一再要求允許他前去把他們杀死。

人群中有些人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他们来自县城以外的地方，来自别的城镇，也有人打长途电话来表示愿意参加当时正在组织起来的自卫队。但是所有经常和我保持联系的人和守卫的人都在我房子后面，因为那就是我们集合和存放那天夜里我们所需的枪枝和弹药的地方。街上都是大群被激怒的和被卷进来的黑人——他们并不属于任何组织，任何集团。他们只是受尽了压迫而武装起来的个别公民。

我去接电话了。我的妻子给了史铁格耳夫人一个椅子。当我回来时，这女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说，“如果你们带我们走出这里，我们就走。”我又一次告诉他们，我没有时间带他们走出去。我告诉她，如果我在同样的情况下被困在她的居住区，我早就没有命了。我说，“你瞧，我们还没有你们的人一半那样残酷。”她承认我说的话是对的。她告诉我，她是一个经常去教堂作礼拜的基督徒，她要帮助我们，她愿意做些她能够做的事。我告诉她，她的丈夫能够帮助我们。她的丈夫说，他不知道他能做些什么，因为他们是住在马歇尔城的，在门罗城里没有什么名望。她继续说，“你就是罗伯特·威廉！”我告诉她，是的。她说，“嗨，我以前从未见过你，但是我听见许多人谈起过你。”我说，“那一定说的都是些坏话。”她说，“是的，我必须承认那都是些坏话。但是你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人。你看起来像是个好人。你比我过去所想的要好得多。”

电话又响了。这是警长曼尼。他说，“罗伯特，你已经在这个城里引起了许多种族纠纷，但是州的部队来啦。在三十分钟内，你就要被吊死在法院的广场上了”。

他挂了电话。又有别人打电话来说，电视台广播了一个消息，州政府正在派军队来包围这个城市。另外有一个女人打电话来说，他看见军队在向城里移动，公路上的巡逻队正在把他们

的車子停在監獄的後面。這件事為一則廣播新聞証實了。於是我們的同伴中有一个人把我叫到了門口。我走出門去，到了街上。我朝四面一望。街的两头都被警車封鎖住。我明白了，他們是要在州里派來的部隊抵達以前，騙我等在這裡。我告訴我的妻子梅蓓爾，我們必須離開這個地方。我說她沒有時間取什么东西了，只能把孩子帶走。我把朱利安·梅菲爾德叫了來，他是剛在史鐵格耳夫婦跟我進屋後走開的。我告訴他州里派來的部隊正在向我住的地方移動，我勸他立刻離開門羅，以便萬一我出了什麼事的時候，有人能夠自由地把事情的始末告訴全世界知道。說罷我們就走了。

是逃亡，但不是亡命之徒

大多數人認為我們出走是為了要逃脫法庭的公訴。但是在那個時候根本沒有對我提起公訴的可能。要記得，我是在知道我曾經救了史鐵格耳夫婦的情況下離開門羅的。我們的逃亡是由於州政府的態度，是由於警長的態度，是由於無法無天。在我們抵達紐約，聽到廣播台和電視台的消息以前，我們並不知道對我們提起了什麼公訴。我們是在離開了北卡羅來納後直接奔向紐約的。起初我想我們會在那邊留下來，在哈勒姆黑人區逗留一個時期，然後就在那里迅速開展一個運動把門羅城發生的殘酷的種族壓迫告訴全世界。就是為了這個理由，我離開了北卡羅來納州；因為只有從州外面我才能集中力量搞宣傳運動，給門羅城寡不敵眾的黑人和“自由乘客”以幫助。我是在警長打電話告訴我州里派的部隊將要來到，並且要在三十分鐘內把我吊死在法院廣場之後才離開北卡羅來納的。我記起了當我向休·B·坎農呼吁按法律給予失蹤的一位“自由乘客”以保護時他所說的

話。这位州长助理告訴我，不論是什么人，他也不管；他說我們既然要求暴力，那就讓我們得到暴力吧。他想知道，“为什么我还没有死！”我在当时并没有想到有什么涉及訴訟的事情。

我第一次听到公訴的事是在紐約，当时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說，到处都是緝拿我的公告，說我因为綁架史铁格耳夫妇而被尤宁县的大陪审团提起了公訴。

联邦調查局声称，它之所以介入这个案件是因为我是一个被法庭提起公訴而越州逃跑、企图躲避公訴的亡命之徒。但是从技术观点来看，联邦調查局是錯誤的，因为那天夜里我很早——大約九点钟——就离开了，第二天大陪审团对我提起公訴的时候，我已經在紐約了。当然不能說，我是作为一个被提起公訴的亡命之徒而越过北卡罗来納州的州界的。

但是只要想一想州政府曾經加在我头上的那种完全莫須有的綁架罪名，就可以知道联邦政府对我指控中的这种技术性錯誤并不奇怪了，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可以“合法地”在美国全国对我实行通緝。在这里提一下紧接着我离开門罗城后所发生的事是很重要的。我是根据两个警察的証詞而被提起公訴的（法院沒有任何記錄說史铁格耳夫妇曾經在大陪审团前出庭）。在法院发出拘票以后，約有一百名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官員，以及武装着机关枪、来福枪、彈压枪和催泪彈的当地警察襲击了我的住所。他們不知道我已經走了。他們不能相信我居然能逃出他們的手。

我是在紐約的報紙上讀到大陪审团的公訴书的。同公訴书一起登在报上的是記者訪問史铁格耳夫人的报道。我不知道，史铁格耳夫人是否在法庭上出現过，她最后究竟向大陪审团說了些什么；但是我确切知道，她讲的話是不能自圓其說的；她从未把同样的話說过两遍。

第二天，我在《紐約郵報》和《紐約時報》上讀到的新聞報道說，當他們追問史鐵格耳夫人的時候，她說我曾經申斥綁架她和她丈夫的人群。但是她又在下一段話里說，我是這些人中的首領，因而我對這件事負有責任。我再往下讀，看到她說，他們曾經被捆綁在我的屋子里，我們的槍口對准他們的脖子，一直到我離開的時候，他們還被捆在那里。但是在說了他們被捆綁的話之後，她又說，他們被我釋放了，沒有受到傷害，而且在一個半鐘點以後就離開了那個地方。

同時，她首先為他們進入黑人居住區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理由。她在一家報紙上說，這是因為他們要走一條近路，而在另一家報紙上又說，這是因為他們迷了路，不知道往那里走。但是那里並沒有穿過我們居住區的公路。史鐵格耳夫婦要假道回到馬希維爾的那條公路離開我們住的那條並不通行的街道約有一英里之遠。任何一個熟悉本縣情況的人不可能在那里迷路的。史鐵格耳這個女人還對一家報紙的記者說，我所住的那所房子，我在那里出生的那所房子，是她父親賣給我父親的，而且她本人也曾在那里住過。瞧吧，在所有這些報道中，說話的總是史鐵格耳夫人，你能看到的總是史鐵格耳夫人的相片。他們從未讓史鐵格耳先生這位有名的三 K 黨人說什麼話。

我還讀到過《夏洛特觀察家報》的一則報道，這則報道引用了史鐵格耳夫人的話說：“威廉只是假裝幫助我們。”那末，她是怎樣知道的呢？我曾經幫助了他們的一個最好的證明就是，他們沒有受到傷害，而且还活着。這他們是知道的。

第六章

門罗事件：迫害黑人的阴谋

在北卡罗来納州門罗城曾經发生并在繼續发生的事情，說明一个古老的真理：为所有的人所共同使用的言詞，对于所有的人并不总是表达同一个意思。人們曾經因为一个共同用詞的意思有分歧而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斗争。白人种族主义者相信“自由”，相信“公平的审讯”，相信“公道”。他真誠地相信这些詞，并且以很大的感情应用它們，因为对于白人种族主义者來說，这些詞意味着他有剥夺黑人的基本人权的自由，他們的法院的所謂“公平审讯”和“公道”，就是維護种族主义者狂妄的白人至上思想的法律程序和判决。在許多紧急的場合，当我们根据宪法所享有的权利被否认、我們的生命遭受危險时，我們會要求司法部和联邦調查局調查門罗的情况，保护我們的生命和恢复宪法賦予我們的权利——換句話說，就是主持公道。他們总是拒絕了我們的要求。

司法部——“极端危險和精神分裂”

美国司法部的行动表明，它在門罗煽动迫害黑人的共謀罪方面并不稍逊于三 K 党。在我們离开門罗后，美国司法部勾結警长 A·A·曼尼，散发了二十五万張“通緝”公告，在这些公告上，他們把我描写成患有精神分裂症。他們說我精神分裂，却不能讲出誰曾对我进行过精神分析。难道他們是根据門罗的那个

半文盲的警长的分析而认为我是精神分裂的嗎？

司法部散发的这些公告又把我說成是“极端危險”的。但是，他們拿不出任何确凿的事实。他們拿不出任何犯罪記錄。他們举不出任何能够表明这个罪状的事件。他們无法說明我曾經伤害过哪一个人。因為他們知道这些都是謊話。那末，美国司法部怎能干出这些事来呢？怎能怀有善意呢？它沒有調查事实，也沒有調查这些恶毒的謊話的来源，就在美国全国散布这些謊話，怎能算是一个公正的調查机关呢？

在他們的公告上有这样的“事实”：我的右眼有一个疤，我的鼻尖左边也有一个疤，我的左腿上也有一个疤。这些都是撒謊，但是这些捏造的所謂疤的可笑謊話把我描繪成一个“嗜杀好斗的黑鬼”或“极端危險”的人物。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国司法部已同三K党合流。他們肯定我是逃不掉的，他們甚至过早地为在美国政府的慫恿下进行私刑吊打准备了借口。他們宣傳我将随时开枪杀人。这样，如果我被抓到而遭到枪杀时，就有了借口。

我逃到加拿大后，他們又把同样的公告傳給加拿大皇家騎警。非常有趣的是，他們在加拿大絕口不提北卡罗来納州曾发生种族事件这一事实。我的唯一罪状就是在南方为爭取人的权利进行了斗争。这的确是一个罪状；在南方，当一个黑人为他的人的权利而斗争时，的确是被认为犯罪的。有許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自从入座示威在南方开始以来，已經有五千个以上的黑人由于爭取他們的权利而被逮捕。南方的几乎所有勇于斗争的領袖都曾經坐过牢，他們的罪状只是爭取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人的权利。

加拿大人不像美国白人成見那么深，因而司法部很怕加拿大人了解这个事件的全部真象，而拒絕合作。他們必須把我描繪成为一个綁票勒索的罪犯——这就是美国政府通过它的机关

美国司法部干的勾当。他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我是在加拿大藏匿的，并且是充分武装着的。

问题又来了：这些情报是哪儿来的呢？是不是美国司法部跑去找了那个我要求他们提起控告的警长呢？就是那一位我曾告发过的警长吗？就是他们都知道的自 1956 年以来一直是三 K 党的朋友、是我的敌人和黑人的敌人的那一位警长吗？是不是他们跑去找了这个被三 K 党提拔的警长，向他要了关于一个美国民权战士的材料呢？看来，他们一定是这样做的。这件事情应当足以唤醒许多人认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司法部本身就是被种族主义者的影响所笼罩的一个机构。

如果我沒有能够逃出美国，我永远也不会去出庭受审，更不用说受到一次公平的审讯了。

其他被告們

史铁格耳夫人报告說，我的家是一个“武器庫”。但是搜查的結果並沒有在我的屋里找到任何武器或彈药的痕迹。因此，警察把我的失踪作为搜查其他邻近居民的借口。他们把房子拆破，恐吓許多甚至沒有参加自卫队的人，整夜审問被认为是我的同伙的人們，沒收他們发现的武器——我們合法拥有的武器。

在我离开一天之后，那些出獄的“自由乘客”向《紐約邮报》和《紐約时报》发表談話說，虽然我不在，他們将繼續进行斗争，他們将繼續进行我們所发动的斗争。他們中有一个来自紐約的二十二岁的白人大学生約翰·劳里。在他宣称斗争将繼續进行的两天后，他被捕了，罪状是共謀。理查德·克劳德，一个当选为門罗非暴力行动委员会主席的十九岁的当地青年，和另一个十七岁的哈罗德·黎亚波一起也被提起了公訴。这些青年曾經參

加糾察綫和入座示威，并在斗争中表现了领导的能力，因此他們也作为共謀犯而被提起公诉。在騷乱开始后才离开北卡罗来納州的梅·馬洛里，也被控犯了共謀罪，但当局沒有立刻逮捕她。

此外，曾参加所有这些斗争的另外两个当地黑人青年，十七岁的艾伯特·罗里和十五岁杰米·柯文頓，則分別被控开枪打警察，然而在門罗城除了一个警察受伤外，再也举不出第二个。杰米·柯文頓被送进感化院，艾伯特·罗里被判坐牢五年。这个案件尚待向最高法院上訴。

另一个在 27 日的騷乱中被捕的白人“自由乘客”，即来自紐約州布魯克林城的理查德·格里斯沃耳德，当天在尤宁县的牢房里被另一囚犯打得几乎死去。行凶的是一个被控犯有伪造和殴打罪的白人囚犯。当时格里斯沃耳德已被打得滿身是血，半昏迷地躺在地上，幸亏另一个被捕的“自由乘客”在被带过那个牢房时救了他的命。这第二个“自由乘客”肯尼思·薛尔曼大声叫嚷，要求把格里斯沃耳德移出牢房以免被打死。看守者害怕这个白人学生死去会惹来麻煩，这才照办的。

第二天，所有的市、县、州和联邦的执法机关，为門罗的治安秩序得到恢复而互相打电报。騷乱发生后那一周，县专员公署給保安执行部的人员每人奖赏一百美元，作为“在門罗‘种族紧急事件’中特别服务的报酬”。

三个星期后，“援助門罗事件被告委员会”从曾同格里斯沃耳德住同一牢房的白人囚犯霍华德·斯塔克那里接到一張他亲笔写的供詞。斯塔克供认，他是在門罗警察局的指示下殴打格里斯沃耳德的，因警察方面答应替他消案，并立即釋放他，作为交換条件。但是，斯塔克获釋两星期后又被捕了，并以所謂已被取消的同样罪状被判罪，因而他把上述供詞寄給“援助門罗事件被告委员会”。

康拉德·利恩把供詞原紙寄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并要求立刻調查門羅警察局。司法部从来沒有承认收到了那份供詞。联邦調查局的特务曾到当地搜集口供，他們甚至訪問了斯塔克。与此同时，尤宁县当局迅速把斯塔克送进精神病院。司法部最后通知利恩說，此案已結束。

苏联来福枪的怪影

不久，美国各报开始报道当地警官的談話說，当他們搜查我們的居住区时，他們发现并沒收了我們的秘密軍火庫：有镰刀和錘子标记的苏联来福枪。他們暗示这些武器是由某种国际共产主义阴谋集团供給的，暗示有一批秘密武器从莫斯科直接运交給我們。这完全是誣蔑。他們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們的許多来福枪是各国制造的。他們沒有报道我們拥有皇冠标记的来福枪和英国的剩余来福枪。为什么他們不把我們看成是希望在美国恢复帝制的英国女皇的代理人呢？他們也沒有提到我們拥有意大利制造的来福枪。他們沒有提及我們也有納粹标记的德国来福枪。这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武器，是毛瑟枪。应当指出，他們认为不值得提出我們有这样一些武器的事。可能是他們喜欢納粹标记的来福枪。他們也沒有提到我們有来自美国陆軍的剩余来福枪，上面有美国陆軍标记的 M—1 型来福枪。为什么他們不想把我們看成同美国陆軍共謀造反呢？

他們只提苏联制造的来福枪，目的在于誣蔑我們的自卫运动。这是一种企图唤起种族主义者的歇斯底里和企图欺騙美国人民的伎倆。这是企图把捏造的刺激人心的冷战問題注射到我們爭取生存的斗争中去。这是企图使美国人民认为門羅自卫运动是对他們的安全的严重威胁。

赤裸裸的事实是，从美国全国各地的陆海軍剩余物資商店和一般的金屬品商店都能够买到这些来福枪。这些枪枝，包括上面有錘子和镰刀标记的苏联来福枪，都是合法买到的。我有购买这些苏联来福枪的购貨单，上面注有这些枪的号码。

这并不是什么特別秘密的供应处或隱蔽的軍火庫。我們曾組織了一个来福枪俱乐部，自1957年就取得了“全国来福枪联合会”的证书。我們被批准拥有来福枪。我們练习射击。在門罗还有另外三个白人的射击俱乐部。那些白人甚至有两个实行种族隔离的高級打靶場，但是沒有一家報紙提到这些事实。

像《紐約邮报》这类報紙开始歇斯底里地叫嚷关于发现苏联来福枪的事情，但是他們却不提这些来福枪是从美国商店公开买到的。这些苏联来福枪并不是自动武器。它們是那种用于体育运动和射击练习的单发步枪，曾在1959年的世界运动会上用过。这种来福枪被称为6.53型，甚至苏联陆軍也不用它。关于“苏联来福枪”的誣蔑成为一些喜欢危言聳听的新聞記者們害人的資料，可是他們对于門罗的警察武装白人匪徒攻击赤手空拳的学生的事件却认为沒有聳人听闻之处。

我有一張从最近的《多倫多星报》剪下来的照片，图上是一些同“約翰·伯奇协会”^①有組織联系的法西斯組織“美国义勇队”的成員。照片显示“义勇队”正在伊利諾斯州接受訓練。不是在密西西比州，也不是在阿拉巴馬州或南卡罗来納州，而是在伊利諾斯州。这些人配备了机关枪和自动步枪，包括約翰遜自动步枪，他們正在用美国陆軍的六点五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在靶場进行实彈射击。他們从哪里得到这些迫击炮的呢？他們从那

① 約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1958年成立的一个法西斯組織。目前該协会在很多州設有分会，它的势力已逐渐扩充到美国国会、軍隊和其他部門。美国很多种族主义团体和法西斯团体隶属于它。——譯者

里得到这些炮弹的呢？在美国没有任何剩余物资商店出售迫击炮和真炮弹。他们从那里得到他们的机关枪和自动步枪呢？其中许多是美国空军还在使用的型号。这些武器不同于我们的武器，是联邦法律明文规定平民不能拥有的自动步枪和机关枪。

这些人戴着标准的钢盔，穿着美国陆军的剩余军装，唯一的差别是他们戴着他们自己的“义勇队”的标志。这些人招募了自己的私人军队；在门罗招募来攻击“自由乘客”的五千人中有一部分就是这个法西斯组织“义勇队”的成员。

没有人对此不安。这些对美国人民的幸福和安全那么关心的满纸虔诚的报纸，竟然对“义勇队”被引进门罗一事只字不提。这些“义勇队”装备有重武器并在野外受训。原因何在？为什么在美国竟容忍这种现象呢？那些“义勇队”自称他们动员起来是为了抵抗共产主义或共产党可能对美国的入侵。哪有一个美国人那么傻，真的相信美国海军陆战队、陆军、海军、空军不能遏止的入侵，竟会被来自约翰·伯奇协会的几个穿球鞋的老太婆和她们的“义勇队”所遏止呢？

不，任何能够正常思考的人都看得出，那些种族主义的“义勇队”武装起来是准备大屠杀的。他们正在形成法西斯的先鋒队，有朝一日他们将放手大干，攻击所有越軌的美籍非洲人和美国白人，而所谓越軌就是勇于争取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这些“义勇队”将是那些干骯髒勾当的人。正如在纳粹的德国有一些专门用煤气炉烧死犹太人的特种部队一样，在法西斯的美国也将有一些“特种部队”用来对付“鬧事者”。这种勾当是美国武装部队干不了的，因为美国武装部队里有黑人，而“义勇队”组织里是没有黑人的。这就像阿尔及利亚有法国陆军和秘密军队组织，在希特勒时期有正规军和冲锋队一样。美国武装部队、警官和司法部将会不聞不問，他们会說：“我們很抱歉，但是我們不能抓

这些人。我們很抱歉，我們已尽了最大的力量来防止暴力”。那些“义勇队”的武器百分之百是美国的，而报纸对他们的活动竟找不到可以指责的理由。

但是，当人数和武器都处于劣势的門罗黑人英勇地起来保卫他們的房舍、家庭和生命的时候，报纸却嘲笑他們的自卫行动，誣蔑他們，暗示他們的武器是某种潜伏的共产党阴谋集团所供給的。

所有的美国人民，不仅是美籍非洲人，应该認識到，如果1961年8月27日在这个北卡罗来納州尤宁县的門罗城我們沒有武装起来，那就可能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那些种族主义暴徒原来计划要攻击黑人居住区，后来所以沒有勇气执行这个计划，其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們知道我們已經很好地武装起来，因而使他們不敢妄想采用暴力了。

他們是这样一些人，既喜欢对人家采用暴力，又希望自己不会遭受暴力的反击。如果持和平主义的黑人一边面颊被打而又轉过另一边去，那正是他們所喜欢的。

我們为保卫我們的家所做的准备和所保持的武装警惕性，同“自由乘客”运动以及我們本地的学生在非暴力原則下所进行的糾察和示威行动完全是两回事。我們武装自己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卫。如果我們不曾武装起来，我們可能已成为屠杀美籍非洲人的現代暴行的牺牲者。让报纸为我們有共产党标志的来福枪而痛哭悲叹吧。我不管来福枪上有什么样的标志，在1961年8月27日星期天那一天，它們是我們的法宝。

加拿大——随后古巴

当我認識到，这不再是一个地方性事件，美国政府已插手进

来并且同三K党一样处心积虑地要消灭我的时候，我决定离开紐約，我认为最好的去处是加拿大。

我觉得加拿大人民会同情我。我也記得，在美国奴隶时代，逃跑的黑人曾利用秘密通道逃到加拿大避难。所以我和我的妻子梅蓓尔一起逃到加拿大。我觉得在加拿大是安全的。最初的几天，我过着正常的生活。我到处观赏商店的橱窗，参观过一次航空表演，去过公园，也去过海滨。似乎我是相当安全的。我觉得我有可能在加拿大住下去，因为我被控的罪状是捏造的。

一个早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一家加拿大报纸的头版刊登了我的一张很大的照片。随照片刊登的新闻說，我是一个凶恶的绑票匪，美国司法部已要求加拿大皇家騎警抓我。它說我是一个工人，一个运货工人。它沒有提到我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尤宁县分会的主席，它也沒有提到我曾編写并发行通訊。

加拿大皇家騎警发动了一次搜查，其恶毒凶猛的程度不亚于美国联邦調查局的搜查。由于許多加拿大人了解美国的种族情况而同情我，加拿大皇家騎警开始搜查住宅。他們甚至搜查多倫多一所教堂（并盘問牧师），就是那一所我在前一个夏天进行巡迴演讲时曾經去过的教堂。我終于肯定加拿大并不比美国安全。我曾和同情我的加拿大人一起拟訂了如果我在加拿大被捕怎样抗拒引渡的計劃。他們准备揭露加拿大当局企图把我送到殘暴、野蛮和实行种族压迫的美国南部。他們替我在加拿大聘請了律师，一旦我被捕，他們将立刻采取法律行动。但是，我幸运地离开了加拿大。

当我認識到我在加拿大并不安全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去古巴的两次旅行。在古巴，一个黑人被当作人来对待，种族問題被理解，人民不会把我看成犯人，而会看成是一个被莫須有的罪状陷害的人。这种罪状的目的在于消灭那些勇于斗争的领导人。

他們已開始形成一個新的運動，一個爭取美籍非洲人徹底解放的新的富有戰鬥性的運動。除了古巴外，我想不出在西半球有第二個這樣的地方

鑑於加拿大的整個東海岸都在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加拿大皇家騎警的監視下，我旅行到加拿大的西海岸，重新進入美國，轉到墨西哥，然後到古巴。這就是我為什麼來古巴的原因，我不能有其他的選擇。

俄亥俄州長為虎作倀

在古巴宣布准許我政治避難以後不久，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避難的梅·馬洛里夫人被當地聯邦調查局的探子逮捕了。北卡羅來納州立刻要求把她引渡到尤寧縣受審。

如果馬洛里夫人被引渡的話，她將同羅里、黎亞波和克勞德等在一起，並將在某一個日子在北卡羅來納州法院受審。在那裡，他們不可能得到公道，特別是處在我已經描述的情況之下。全國各地人民的壓力正在增長，許多人準備抗議這一重大的濫用法律的事件，因為起訴書要求判處他們無期徒刑。

當馬洛里夫人在克利夫蘭被捕時，俄亥俄州有相當多的人提出抗議。由於美籍非洲人社團的壓力，馬丁·路德·金牧師簽署了門羅保衛委員會的請願書，要求密查爾·迪薩爾州長不要引渡梅·馬洛里。馬洛里夫人獲准受一次行政審訊。兩個月後，迪薩爾州長決定引渡馬洛里夫人回門羅。

迪薩爾州長不顧來自克利夫蘭和全國各地的工會、公民權利組織和社會團體的成千封抗議書和電報，仍然作出上述決定，並拒絕改變。迪薩爾州長為他的決定辯解，說這是根據他同北卡羅來納州長特里·桑福德的兩次電話會談作出的，後者向迪

薩爾州長“保證馬洛里夫人將在北卡羅來納法院得到公平的審判”。

難道這位號稱為偉大的開明的俄亥俄州長僅僅因為北卡羅來納州長的保證，就真的相信黑人能够在北卡羅來納法院得到正義嗎？北卡羅來納是這樣一個州，在那里，有一個黑種男人因被控向一個白種女子眉目傳情，或過于注視，就被判處五年徒刑。儘管當時的事實是他遠離她七十五英尺，他還是被州最高法院判處五年徒刑。

它也是這樣一個州，在那里，僅在兩年以前，一個十七歲的黑人少女由于抗議監獄的伙食太壞，竟被看守活活地打死。州政府給她的父母一千九百美元就算了事。

很明显，這就是迪薩爾州長關於“保證”黑人得到正義的概念。自從8月份陷害事件以來所發生的事情，難道使他對於北卡羅來納州的所謂“正義”覺得更有保證嗎？

它是這樣一個州，在那里，當迪薩爾州長在初秋通過電話向特里·桑福德州長“仔細地了解北卡羅來納州維護正義的記錄”時，一個黑人少女被四個白人強姦了；她能够無誤地辨認那四個白人，却无法從任何北卡羅來納州的司法機關得到正義。她先後去過馬希維爾警察局、尤寧縣縣長辦公室和聯邦調查局，告訴他們，她被強姦，並且告訴他們強姦者的姓名。但是他們都置之不理。當地聯邦調查局辦事處借口這是地方事務而拒絕受理。最後，當來自黑人社團的壓力增長到快要爆炸時，其中一個強姦犯被控告和受審，但在五分鐘內就被宣判無罪。

在這同一個州，在迪薩爾州長決定引渡梅·馬洛里以後只有幾個星期，一個二十歲的黑人因強姦的罪名而被判處十到二十年的徒刑。儘管那個被強姦的白人女子在法院里一再說明被告並不是強姦她的人，白人陪審團還是把被告判罪。他們這樣

平的原因是，他們知道被告同那个白人女子是很久的朋友——这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

同时，在这同一个北卡罗来納州，在这同一个門罗市，另一个因被誣告三項罪状而被拘禁二十天的黑人青年，当他嘗試从他被拘禁的牢房逃跑时，被一个警察开枪打伤了腿部。这间牢房就是理查德·格里斯沃耳德被殘暴地毆打的那間房。沒有一个北卡罗来納州的律师願意为这个名叫查凡·柯文頓的青年辯护。最后，首都华盛顿的两位青年律师在預定开审前只有一个星期的时刻才自願当辯护律师，但是法院拒絕給他們更多的時間准备辯护。查凡·柯文頓被宣判犯了三項刑事罪。他也被宣判犯了两項違警罪，即抗拒逮捕（因为他要求知道他为什么被捕）和企图逃跑。他因这些罪状被判处七年到十年徒刑。当他上訴时，法院規定在上訴期間的保釋金为一万五千五百美元。因此，查凡·柯文頓仍旧被关在牢房里。最近他受到威胁，如果他坚持上訴，将被另加一个“秘密打人”的罪状。

这同一个法院，同样的法律对于一个被控杀人罪的白人，一个三K党的公开党员，只規定二千美元的保釋金。这个白人被控开枪击中一个黑人男子的后脑而把他打死了。被告并不否认他开枪。他解釋說，他发现那个黑人在偷看当地一家妓院。在这件事情发生前一个星期，另一个黑人被一个白人开枪打中臀部，伤势严重，却因无法交出八千美元的保釋金而坐牢，那个行凶的白人反而逍遙法外。他辯称，他开枪打那个黑人，是因为后者企图闖进屋內或偷看——門罗的法院还没有决定，要怎么說才能够在审讯中听起来最令人相信。

这就是北卡罗来納州，在那里，当我们只是要求州政府的第二号最高級官員維持治安时，他竟因我还活着而表示惊奇。这就是桑福德州长要把梅·馬洛里送回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正

义等待着正在那里候审的黑人青年，等待着約翰·羅里。

馬洛里事件再一次提醒我們，任何一个美籍非洲人只要他住在种族主义者盘踞的地方，就不能够躲开三K党的魔掌。一个北方的州勾結南方从事私刑，这是对美国司法真象的一个暴露。馬洛里事件证明，甚至像俄亥俄这样一个北方的州也帮助种族主义者。特里·桑福德知道他能够指望像迪薩尔这样的同属民主党的人交还避难的奴隶。

呼吁全世界：“請注視門羅”

在梅·馬洛里被送回北卡罗来納州之后，同我一起被控告的人們，将在某一天在北卡罗来納州門羅的法院受审。唯有警醒的和激憤的世界輿論才可能把他們从政府当局預謀的陷害中拯救出来。唯有世界輿論的視線高度集中在門羅的法院，才可能抑制种族主义当局。

我們呼吁全世界注視門羅，并对一个自称为“自由世界”領袖的政府迫害爭取自由的青年的事件表示憤怒和震驚。

我們已經发动一个世界性的签名运动，以便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控訴书，要求对門羅市剝夺人权事件立刻进行国际調查。我們呼吁世界各地的劳工組織、人权委员会和学生組織参加这次抗議运动。

关于門羅的被告，我們所抱的唯一希望是，美国还殘留一些文明气息，能考虑全世界对它虐待美籍非洲人的公憤而有所反应。我們希望世界公憤的压力將迫使美国政府使他們得到公平待遇，而不管他們的种族，不管他們作为自由战士的作用和他們对种族主义制度的反对。我們希望他們將回到相信社会正义的人們的正派的社会中来。

这不是一个新的策略。世界的公憤曾在門羅“吻臉事件”中拯救了两名年青人，使他們免除十四年感化院的判罪。在 1960 年，当門羅市政府官員拟訂一个“城市更新計劃”，申請使用联邦“清除貧民窟”基金来拆毀有色人种住区的房屋时，我們打电报給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名誉會員潘迪特·尼赫魯，提出控訴。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統正在印度作尼赫魯的客人。联邦房屋管理局后来拒絕批准門羅的計劃。1961 年，在入侵占巴失敗之后，当肯尼迪总統借口“为了自由的事业”替美国的侵略辯护时，我們公开打电报（在联合国宣讀）給总統，要求他提供同样数量的美国坦克、飞机、大炮、机关枪和雇佣兵，来对抗北卡罗来納州的三 K 党。

目前唯一不同的是，我們將以更大的規模動員輿論。当种族主义者迫使我流亡时，他們違反本意地引导我进入一个更辽闊的斗争場地。

这是我們举行示威的时候了，像那一次我們向联合国抗議私刑杀害卢蒙巴一样。我們必須表現那种迫使这个国家在世界人民面前受困的勇气。与此同时，我們將进一步把我們的斗争同我們在非洲的弟兄們爭取解放的斗争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被压迫者的斗争联系起来。他們也将进一步把他們的斗争同我們的斗争联系起来。立刻消除种族歧視是美国政府做得到的，但是它纵容和煽动对黑人的歧視。

这个政府将越来越发现它所纵容和煽动的反对美籍非洲人的每一歧視行动，将被它所希望施加影响的“不結盟”的有色人民看作是迫害他們的弟兄的罪行。

第七章

自卫：美国的傳統

向压迫者的良心恳求，是不能解脱压迫的絞索的。要对种族压迫这样根本性的問題进行社会变革，就需要用暴力。在这个問題上，沒有暴力和翻天覆地的变革是不能有进展的，因为对一些人來說这是保持生存的斗争，对另一些人來說这是求解放的斗争。掌权者在维护他們的地位和特权时总是殘酷无情的。这不是供美国人思索的抽象法則，这是在美国誕生时就被揭示出来，并繼續为我們的历史所无数次揭示出来的真理。自卫的原則是始于列克辛頓和康克德战役^①的一种美国傳統。

为种族主义扭偏了的人心

我們終于了解了种族主义的性质。这是一种群众性的精神状态。当我向外国記者，古巴人和其它拉丁美洲人讲述美国的种族状况时，他們对美国种族仇恨之深都大为震惊。我引证了这样一些极端的例子，如在尤宁县实行了电话綫路的种族隔离，在华盛顿实行了爱畜葬地的隔离，因而使美国黑人无法埋葬自己的狗等等，他們都感到既可笑又可悲。

这种关于种族主义心理状态的极端例子，只有当作一种孤立現象看待的时候，才显得荒唐可笑。实际上这些例子，按照构成种族主义心理状态的前提來說，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如果这样来看待这种現象，那么这些例子就是极端病态心理的必然产

^①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著名战役。——譯者

物。种族主义者是一种一想到同黑人进行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就要歇斯底里得发疯的人。正是这种叫做种族主义的群众性的心理病态，构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美国黑人的解放最终在美国实现时，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许多新发展之一，将是建立某种能够纠正那些被种族主义所完全扭偏了心的美国人的政体。总归会找到一种办法使这些疯子变得健康和健全起来。

* * *

“我们必须创造黑人的战斗精神……”

现在是美国黑人行动的时候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和战斗精神正在增长。我所说的是人民群众，是我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孙维尔，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萨凡那、梅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查理斯顿和格临维尔等地认识和访问过的黑人群众。他们就是那些我在哈勒姆的街上，在底特律和芝加哥的街上所遇到的受压迫、受剥削的黑人。我说的也就是门罗的人们，那里在五年以前当我开始谈自卫的时候，我走在街上，我的许多黑人邻居都会走开躲避我。而今天，尽管有联邦调查局的通缉和我的逃亡，尽管有陷害性的逮捕和随之而来的枪杀，尽管有把《十字军战士报》的职员约翰逊太太从门罗赶走这样的威吓运动，尽管有这一切，但是门罗的黑人仍然继续进行着斗争。

作为《十字军战士报》的编辑，我在1960年秋天到南方去，深入到种族歧视地区，去考察争取自由的斗争。那时我就看到在南方各州到处洋溢着一种新的令人鼓舞的精神——这是几年前还在文明的空白点充当奴隶的人民所具有的要求打碎奴隶锁链的决心和英勇精神。我一天天地看到关于美国黑人没有能力团

結和行動的古老神話破滅了。

在薩凡那，一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領導人捐贈了三萬元給地方分會。分會有一個專職的工作人員和有好幾個房間的辦公處。糾察員和入座示威的人都挨了打，遭到解雇，但鬥爭還是進行下去。那里的領導人不怕對他施加的暴力，因為人民同他在一起。在那個城里，有位美國黑人工會領袖說，美國黑人群眾終於認識到“我們必須用暴力對付暴力來保衛自己”。許多黑人群眾都說，美國的白人種族主義者必需挨一頓好“揍”，打掉他們的威風和白人的優越狂。

我在阿特蘭塔聽說，伊萊哲·穆罕默德先生給人以很深的印象，而且使得那些可尊敬的黑人領袖感到狼狽不堪的是，許多美國黑人現在也都知道，他可以貢獻的東西遠遠超過祈求得救的軟弱禱告。南卡羅來納州有一位著名的牧師說，“我們最大的絆腳石是湯姆叔叔式的牧師，人們必須停止付錢給這些叛徒。”在阿特蘭塔有位大學教授，他對黑人的新精神感到很興奮，非常希望新的有戰鬥性的領導會代替老的湯姆叔叔們。他深信，這些湯姆叔叔的日子是屈指可數了。

我們中也有一些例外。那些湯姆叔叔、猶大^①和黑人“上層人士”中的奎斯林^②，會否認這種正在增長着的覺悟。他們盡一切可能使美國的白人相信那不是真的，同時又為那些壓迫我們的人辯解。這些“負責的”黑人中有些人害怕戰鬥的行動會損害“良好的種族關係”。他們抱怨說種族關係可能惡化到使許多黑人丟掉飯碗的地步。他們的意思是，會丟掉他們自己的飯碗。因為黑人工人總是最先被解雇，最後被雇用——如果也曾被雇用

① 猶大(Judas)，聖經中出賣耶穌的使徒。——譯者

② 奎斯林(Quisling)，1940年在納粹統治下組織的挪威傀儡政府的人物。——譯者

过的話。他們的情况已經坏得不能再坏了。

我們認識到，在我們自己的队伍中必須展开斗争，从背叛我們的黑人奎斯林手里把領導权夺过来。这样，那些把几十万美元傾投到我們在南方的斗争中来，想把我們改变成和平主义者的白人自由主义分子，就不得不接受我們对形势的理解，要不然，他們就只好拋掉他們自由主义的伪装。

为什么白人自由主义分子要我們不用暴力呢？我們不是迫害者。我們遭受牺牲已經三百多年了！但是沒有誰花錢到南方去要求种族主义者成为殉道者或和平主义者。他們总是到被踐踏的黑人这里来，这些黑人已經受尽压迫，并且作为一个集体也太順从了，而白人自由主义分子却还要他們不要还击。当白人向黑人灌輸一种特別的学說时，似乎有某种奇怪的利益一致之处。这就像种植园主要利用神学来使奴隶基督徒化一样。奴隶所受到那样的一种教育不能产生积极进取的独立精神和寻求正义的精神（这种精神在美国还是殖民地的时候称之为新英格兰的良心），他們被灌輸的是“相信你的主人”、死后升天的基督教式的十足奴化宣傳。

正因为我們的战斗精神在增长，他們才花几十万的美元来把我們改变成和平主义者。正是因为我們的战斗精神在增长，他們才出于恐惧到我們这里来。

那些高貴的黑人領導是非暴力的最直言不諱的代表者。但这些人，尤其是牧师們，既然是这么純粹的和平主义者，为什么他們之中很少有人指責美国的战争准备呢？为什么他們中間出来反对原子彈的人这么少呢？这难道不是人們可以从真誠的和平主义者那里指望听到并且的确听到的宣傳嗎？負有責任的黑人領導所关心的是我們不要同白人种族主义者进行斗争，不要去“煽动”和触怒他們，只是在这个範圍內，他們才是和平主义

者。他們經常向我們說，如果我們採取暴力自衛，我們就會被消滅。他們並非阻止一切暴力，他們只是由於害怕被消滅而阻止對白人種族主義者使用防衛性的暴力。

害怕消滅是我們已在門羅揭穿的一個神話。我們揭穿這種神話，是因為我們對種族主義制度終於有了一種積極的了解，同時掌握了暴力和種族主義之間的關係。暴力存在於種族主義制度的深處。美國黑人鬥士之所以富有“戰鬥精神”，是因為他在保衛他自己，保衛他的家屬、他的家庭和他的尊嚴。他並沒有把暴力帶到種族主義的社會制度里去，暴力早已在那里存在，並且一直就在那里存在。恰恰是這種沒有受到挑戰的暴力使得種族主義的社會制度延續了下來。當人們說他們反對黑人“使用暴力”時，他們真正的意思是他們反對黑人保衛自己，反對黑人对白人種族主義者獨家壟斷暴力進行挑戰。門羅的經驗表明，只有暴力對雙方都有威脅的時候，法律才傾向於保持和平。

當美國黑人為他們的權利而進行抵抗和鬥爭時，他們擁有的力量不只是他們的意志和雙手所產生的力量。處在今天的世界形勢下，最種族主義和法西斯的美國政府，顯然不能將兩千萬黑人都消滅掉。我們知道，今天世界上正在進行着一場偉大的爭奪權力的鬥爭，而真正能左右力量對比的是有色人種。我們也都知道，根據底特律幾次種族暴動的統計，這個國家的生產會在四十八小時內垮台。全世界的人民隨時都準備支持我們的鬥爭。

我們也不要忘記，就是這一些進行欺騙性的和平主義說教的富裕的南方黑人，從鬥爭中得到了好處，在大多數美國黑人還在受苦時，他們過着奢侈的生活。這些人比附近的南卡羅來納州查理斯頓地方的黑人奎斯林好在哪里呢？這些奎斯林隨身攜帶着反對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和反對種族合一的宣傳品，帶着一大卷的鈔票和公費報銷單，帶着白種公民委員會的祝福，乘一輛

嶄新的粉紅色的《卡迪拉克》牌汽車到處兜風。當白人種族主義者陷於絕望的時候，黑人猶太們的身價就抬高了，這是一種很有諷刺意味的現象，——雖然白人種族主義者陷於絕望對於我們這些從他們的叛賣行為中吃到苦頭的人來說，倒是一點小小的安慰。

在門羅我們同三K黨鬥爭，而被宣告有罪。門羅有些孩子成長起來受不到任何教育，有些孩子沒有鞋穿，有些沒有東西吃。老年人缺乏醫藥照顧。門羅的黑人沒有工作，沒有福利。擔任官職的黑人領導在北方籌來了許多錢，但沒有一人給一分錢給門羅，因為捐錢的白人自由主義者認為我們是歹徒和凶手。他們寧願讓我們受苦而不願表示和我們的立場一致。他們派大隊貨車到南方其他各地，却因為我們採取了英勇的立場就同我們作對。

我們的那些赤著腳長大的孩子們在成長中也就培養了在種族歧視的學校里所得不到的辨明方向的意識。在門羅曾經有過黑人少年發生集團毆鬥的危險。但是當他們認識到這個問題因而解決了他們的困難時，這種危險就減少了。黑人青年感染上想干一番事業的願望是很自然的。這種願望如果受到活力較少的成年人的壓抑，就可能被引向錯誤的方向。青年人的精力能夠被引導到建設性的英勇行動中去。應該使青年黑人建設性地向種族的不公正展開鬥爭，而不要在自己人中間開火，這完全是一種常識。危險不因肤色的界綫而有所差別；應該為了正義的事業去流血，而不要僅僅為了血的刺激就去流血。現代青年沸騰着一種叛逆的精神。最好把這種叛逆精神用來反對真正的敵人，而不要用來反對那些甚至還不能解釋為什麼發生危險衝突的少年學生。

蒙哥馬利城的公共汽車抵制事件也許是採取徹底的和平主義行動的最成功的例子。但我們必須記住，在蒙哥馬利儘管黑

人能够坐在公共汽車的前面，但那里也有黑人在挨餓。蒙哥馬利城的公共汽車抵制运动是一个胜利，但那是有限的胜利。这沒有提高黑人的生活水平，这并不意味着黑人小孩能受較好的教育，这并不意味着經濟方面的进步。

对白人种族主义者來說，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問題呢？他們有什么牺牲呢？要知道在蒙哥馬利城大多数美国白人有汽車因而并不靠公共汽車。这就像我們要求在門罗圖書館中实行的种族合一經驗一样。我訪問过我們县的議会主席，我告訴他我代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要求共同使用圖書館，因為我們自己的圖書館燒掉了。他說，“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你們不能同我們的人使用同一个圖書館。这不会造成什么差別。反正我是不去看书的。”在南部的很多白人对蒙哥馬利城汽車抵制所采取的态度就是这样。控制着該城的白人反正不坐公共汽車，他們有私人汽車，因此这对他們沒有絲毫影响。

但是当美国黑人參加到爭取有权过人的生活 and 得到和白人同工同酬的权利的斗争中去时，他們就会遇到最大限度的抵抗，包括为警察所寬容或鼓励的暴行。在那样的情况下，必須使种族主义者明白，向我們进攻他們自己就得冒生命危險。他們的生命到底是白种人的生命，而他們认为白种人的生命是优等的，他們为什么还要冒險以优等的生命来拚劣等的生命呢？

我現在相信，許多其他的黑人也相信，我們必須創造我們自己的黑人战斗精神。我們必須領導我們自己的斗争，实现我們自己的目标。我們必須承认，許多美国黑人对于控制着“黑人”自由运动的所謂白人自由主义者，已經不相信或极端怀疑了。他們感到沒有一个白人能够理解一个受压迫的黑人的处境。民权团体的傳統的白人自由主义領導，甚至那些白人急进派，一般都不理解我們的斗争是什么，以及我們是怎样看待我們的斗争

的。他們总是把我們的斗争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多少年来，我們也沒有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

他們为了保持良好的公众关系宁願忍耐。但我們对报上的好評并不感兴趣。我們的兴趣在于得到自由。对我來說，压迫是有害的，是痛苦的。早晨，我作为一个受压迫的黑人醒来。中午，我作为一个受压迫的黑人吃午飯。晚上，我作为一个受压迫的黑人上床睡觉。如果我能够在三十秒钟內获得自由，也不会嫌快。

1827年创刊的第一張美国黑人报纸在第一篇社論中开头就說，“別人替我們說話的时间已經太长了”。这句话从第一次在《自由新聞》上出現以来，已經过了一个半世紀，但这句话的真理的光芒並沒有黯淡下去。这句话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恰当了。

的确也有一些白人，他們願意帮助我們而不附带任何条件。他們願意讓我們領導我們自己的斗争；他們真誠地关心黑人的解放。如果不是由于我从北方的一些白人那里得到了支持的話，我是不可能南方呆这么长的。如果沒有白人的帮助，我永远也逃脫不了由联邦調查局煽起的私刑杀害的追纵，也到不了古巴去避难。为了正义，为了人的尊严，他們将会願意繼續帮助我們。

“美国的每一种自由运动都被 貼上‘共产主义’的标籤”

我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大多数思想正派的美国人現在都会感到，在美国发生的每一种自由运动，每一种爭取人的体面和尊严的运动，每一种寻求公正和社会正义的运动，每一种爭取人权的运动，都被烙上“共产主义的”标记。一旦有一个白人参加了爭取黑人解放的运动，这个运动就自动地被扣上了“在莫斯科支配下”的罪名。我也不能期望有什么例外。

这种共产主义的玩艺儿现在变成了一个陈旧的标本，成为陈旧的标准罪状。任何一个不妥协地反对种族主义者的人，任何一个唾弃宗教狂热者和头号保守分子的人，都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

这样一来就给了共产主义者很多声望，因为在南方我所进行的运动中，的确有很多人都对共产主义者没有认识。我们的大多数人甚至从未听到过马克思。当你谈到马克思的时候，有些人会以为你谈的可能是一支钢笔，或者是纽约市的出租汽车的司机，或者是电影中的喜剧演员。

但是人们热望自由。在人们受到压迫时，他们就要求获得解放，不管领导者来自何处。在卡尔·马克思诞生以前，美国南方就实行着对黑人的压迫和奴役，而在马克思主义存在以前，黑人就一直进行着反抗压迫的起义。甚至早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期，在贩运奴隶的船上黑人就进行过起义。美国黑人奴隶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着黑人进行各色各样的秘密策划和起义的历史。

确实，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了黑人争取人权的斗争，但黑人不需要由任何哲学家或政党来告诉他种族压迫是不对的。种族压迫本身就使得黑人起来反抗。门罗的人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抗议的，他们是在这个基础上拒绝附和种族歧视社会中的种族歧视的生活准则的，他们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来反对种族偏见的。我们知道，南方的顽固派、南方的种族主义者是精神不健康的人，是有病的人。说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以经济剥削为基础，这是不在话下的。

我们是被压迫者，不论这种压迫的根源和目的如何，实行压迫的种族主义者的思想和人格已经误入邪道过久，以致他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即便经济情况有了改变，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并需要一个巨大的震动，才能治好这种精神病。我看到过治

疗某些精神病的最有效的方法，其一就是震动疗法。而震动治疗必須首先来自美国黑人本身，以及他們同他們的白人同盟者和白人青年們的联合。

我所领导的运动不是政治組織，它同政治团体沒有任何組織联系。这是憎恨压迫的人民的运动。但是关于我們的运动我想指出一点。美国的压迫者和种族主义者，最好把发生在北卡罗来納州門罗的事件，当作一个教訓。因为它象征着一种新的态度，象征着一个新的时代。它意味着黑人正在发动起来。它意味着今后还会有更多的种族爆炸。門罗只不过是开始。我敢預言門罗将成为新的美国黑人的象征；成为美国黑人不惜任何代价决心使自己摆脱种族偏見的污辱，摆脱种族仇恨和压迫的痛苦的象征。

黑人民族主义——另一个标籤

黑人民族主义的标籤如同共产主义的标籤一样，是毫无意义的。美国黑人憎恨被抛在一旁和遭受压迫，憎恨不許进入美国社会的主流。他們因为受到排斥而形成自己的集团，开始試圖創立自己美滿的社会，于是他們就被称为“黑人民族主义者”。

这是一个使人迷惑的头銜。因为你首先必須記住，我是一个美国黑人，并且被剝夺了进入美国社会主流的权利。作为一个美国黑人，我受到排斥和歧視。在美国，我們是最受排挤、最受歧視的集团，是最受歧視的階級。因此很自然地，我把絕大部分精力用来解放我的人民，他們是最受压迫的階級。

至于說到“黑人民族主义者”，这是很难下定义的一个字眼。如果从排斥白人或者歧視白人，或者对白人有偏見一点來說，那我可以說，我不是一个“黑人民族主义者”。我倒宁願把自己看成

是一个“泛”民族主义者。这就是說，我对全人类的問題都感兴趣，我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問題都感兴趣。我相信我們都有同样的斗争，爭取解放的斗争。歧视和种族仇视是讨厌的，正如我反对美国的种族歧视一样，我也反对世界上各个角落和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

我們說的“民族主义”是什么意思呢？目前的白人美国社会，不能把它說成是別的，而只能說它是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社会。但是，只要一个美国黑人为他的人民說話，意識到他的人民的历史根源和文化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他就成了“民族主义者”了。我不在乎这种标签，也不介意人們怎么称呼我。我相信让一切人享有的正义。由于美国黑人在我們的社会里是最受剝削和最受压迫的，我願首先尽力来爭取他們的解放。

* * *

非暴力和自卫

非暴力的策略將繼續下去，并且應該繼續下去。在門罗我們也是相信非暴力的策略的。我們使用过这种策略；我們使用过各种策略。但我們也相信，任何爭取自由的斗争都應該是灵活的斗争。我們不应采取这样一种态度，认为只有一种方法是解放的道路。这会成为教条主义。这会陷入如同某些宗教狂热者所实行的那种同样的教条主义。我們不能发展这样一种态度。

如果非暴力可行，我們必須把它当作一种手段来使用。但是終有一天，情况将变得非常明显，那时非暴力本身将会成为一种自杀的行动。我們在同一个美国舞台上看到更多使用暴力的日子无疑正在来临。那些曾經非难我們使用武器来自卫的黑人

把他們自己武装起来的日子无疑正在来临。有些人自以为痛恨这样一种想法：扛枪保卫过美国的黑人老兵，会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妻子儿女、自己的家和自己的生命。这些人有一天也会大声鼓吹自卫的。当暴力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是以象征的方式而是以全面流血的运动来袭击他們的亲属和家庭时，他們就会成为首先主張自卫的人，并且把他們的这种立場說成是求生存的問題。当事情不再仅仅涉及只是一些統計数字的某些遙远的黑人，不仅是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的时候，当事情不再只是涉及到他們的邻居，而是涉及到他們自己，并且成为拯救自己的事情时，他們的態度就会改变。

作为一种战术，我們使用并贊成非暴力抵抗。但是，我們也相信，如果一个人听任自己受辱，任人拳打脚踢，听任妻子儿女受到攻击，并且认为，自己是那样虔誠和公正，如果他进行反击就会沽辱自己的人格，因而拒絕保卫他們的妻子儿女和他自己，那么，这种人是不会有人的尊严的。

我們知道，普通的美国黑人都不是和平主义者。他們不是并且从来不是和平主义者，他們不是由那种会变成良好的和平主义者的材料造成的。那些对絕大多数黑人不是和平主义者这一点有怀疑的人，不妨打一个黑人試試看。从美国任何一条街上随便挑一个黑人来，他們就会发现黑人相信多少把另一頰轉过去的道理。

所有那些胆敢动手的人都会痛苦地发现美国黑人不是和平主义者，不能永远指望他們不保卫自己。那些殘酷无情地毆打他們的人，不能再期望不受懲罰地进行毆打了。

美国黑人不能忘記，他在这个国家所受的奴役并沒因为和平主义者向奴隶主的基督徒良心所施的道义压力和崇高的呼吁而得到消除。

亨利·戴維·梭羅^①是一个被人理想化了的非暴力的使徒，这位作家影响了甘地，而且通过甘地又影响了馬丁·路德·金。但是，梭羅不是个教条主义者，他的眼睛是睜开的，并且看得很清楚。我身边带着一本梭羅的《为約翰·布朗^②大尉請命》，其中的真理在1962年一如在1859年一样明白，他写道：

“……为了拯救奴隶，人有完全的权利用武力干涉奴隶主，这是他的（約翰·布朗的）特殊教义。我很贊同他。那些不断为奴役所震惊的人，也有权为奴隶主的暴死而震惊，但奴隶主活着将比他死去更使他們感到震惊。那些能够做到最快解放奴隶的人，我不会唐突地认为他的方法是錯誤的。

“当我說我宁願要布朗大尉的博爱，而不要那种既不打死我也不解放我的博爱时，我是在替奴隶說話。……我不願杀人也不願被人杀害，但我能預見到在某种环境下，杀人和被人杀对我都是无法避免的。我們以每天的細小的暴力行动保持着我們这个社会的所謂和平。看看警察的警棍和手铐！看看監獄！……我們只希望平安地生活在这种临时軍队的边缘。我們也就是这样保护着自己和我們的鸡舍，保持着奴役的制度。我知道我国的群众认为夏普的来福枪和左輪手枪唯一正当的用途是在受到他国侮辱时用来决斗，或用来赶走印第安人，或用来射击逃亡的奴隶或其他同类的东西。我认为夏普的来福枪和左輪手枪这一次是用于正义的事业。这些工具是掌握在一个能够使用他們的人手里。

① 亨利·戴維·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美国著名作家，同情黑人的解放斗争。

② 約翰·布朗(John Brown, 1800—1859)，美国著名廢奴运动者，主張用暴力廢除奴隶制度。1859年10月，他率領二十二人襲击弗吉尼亚州的哈卜渡口，占領了設在該地的联邦軍械庫，后在反动軍队的圍攻下失敗被俘，被处絞刑。 譯者

“那种据说一度曾使教堂纯洁的基督的愤怒会再一次使教堂纯洁起来^①。问题不在于武装，而在使用武器的精神。在美国还没有谁如此热爱他的同胞，对他的同胞这么好。他（约翰·布朗）活着是为了他的同胞。他为他们而生，也因为他们而死。由和平的公民而不是由士兵，由牧师而不是由俗人，由教友会教徒而不是由战斗的集团，由教友会的女教徒而不是由男教徒所鼓励的暴力，是一种什么样的暴力呢？”

“这件事告诉我还存在着死这样一个事实，还存在着人死亡的可能性。在这以前美国似乎是没有什么人曾经死亡过。因为一个人要死，必须首先要生存过。”

反对和摧毁那些通向更幸福的生活道路上的障碍，这是美国黑人同所有其他的人所共有的天性。

“未来属于今天的被压迫者”

每当我在哈瓦那的英语电台广播时（这是向美国的听众广播的），我总希望以某种方式渗入美国白人的精神壁垒，向他们的思想意识中介绍一些新的引起不安的东西。我希望使他们认识到，由于压迫黑人，他们参与了滔天的罪行。无论如何，我要设法清楚地反映这个种族主义社会中所固有的罪恶形象，以使美国白人能够诚实地和充分地看清他们自己的真面目。使他们能像外国人看他们那样清楚地看自己，并且承认他们不是民主的战士。使他们了解，在今天，他们甚至并不真正相信民主。使他们懂得，不管他们怎么想，不管他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世界是在

① 据《圣经》中载，耶稣到耶路撒冷的一个教堂时，看见教堂为许多投机商人和其他坏人所占据，作为进行罪恶活动的场所，耶稣愤怒地用手杖将他们赶了出去。——译者

变化。

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看一看自己的实际情况，他们受到的震动对他们会有很大的疗效。可能有很多正派的美国人会因此理解到，如果这个社会要想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改邪归正；就会理解到在目前世界上没有种族主义国家的地位。

作为个人来看，我并不喜欢“政治”。我所关心的唯一的事是正义和解放。我不属于任何政治党派。但是我认为，只要目前的政策占优势，黑人就不能同美国社会融为一体。在这以前，将需要有巨大的政治变革。

那些最否认今后的逻辑发展的美国人，就是迫使我逃亡的人。这些人是残酷的。但是，不管如何残酷，这次流亡还不是这些人替我策划的结局。决定我命运的事并不操在今天的压迫者的手中。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使他们不能了解这一点，正如他们的地位使他们不会懂得，非洲每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领袖都被监禁过或逃亡过，今天拉丁美洲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未来领袖们，都正在经历着监禁、流亡或更坏的遭遇。

未来属于今天的被压迫者，我将在美国黑人的解放中亲眼看到这个未来。

附录：

“仇恨总是悲惨的”

馬丁·路德·金

那些坚持非暴力直接行动手段的人承认，法律和法庭命令只能有助于宣布权利，但决不能使其彻底实现。只有当人们自己开始行动起来时，纸上的权利才能有生命力。非暴力抵抗手段之所以有效，在于：它有办法解除敌人的武装，它揭露敌人精神上的防御，沮丧敌人的士气，同时影响敌人的良心。

非暴力抵抗还能提供一种创造性力量，人们可以通过这种力量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当然，这并不是要求人们放弃他们的不满，这种不满是正当的和健康的。非暴力防止这种不满蜕化成有害的苦难和仇恨。仇恨总是悲惨的，它对仇恨者和被仇恨者都是有害的，它丑化人的品格，损害人的灵魂。精神病学家告诉我们，很多在潜意识中产生的内部矛盾和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是由于仇恨而来的。因此，他们现在说，“要末是爱，要末是死亡。”这就是非暴力的优点，它宣布，你们不用仇恨就能斗争，你们不用暴力就能作战。

作为一个种族，我们必须满怀热情和坚定不移地为争取成为一个一等公民而尽力，但是我们决不采取二等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如果采取这种手段，那末，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是凄凉而痛苦的长夜的受害者，我们留给后代的主要遗产也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无意义的混乱时代。

我們已經到了這樣的一天，即對作為人類的我們來說，僅僅一点点自由已經不夠了，對由我們組成的民族來說，也是一樣。我們已經得到些許自由，但是，和麵包不同，一片麵包即可減少飢餓，而一点点自由再也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了。自由像生命一樣。不能分期賦予你生命，不能只給你呼吸而不給你身體，也不能只給你心臟而不給你血管。自由是一個整體，你要全部占有它，否則，你就沒有自由。

我們的命運是和美國的命運聯在一起的，兩個世紀來，我們無償地建設了美國，我們造成了棉花大王，我們建設了我們的家，也建設了我們主人的家，我們忍受了不公正和屈辱，但是，無限的生命力繼續使我們生活和成長下去。如果難以形容的殘酷奴隸制不能消滅我們，那末我們所面臨的反對者必將失敗。我們感到我們是美國的心——我們是它的受苦的靈魂。

（錄自1962年7月在首都華盛頓向《全國新聞俱樂部》的講演）

非暴力的社会組織

馬丁·路德·金

說来这有些不像,但事实却正是这样,那就是爭取民权的斗争已經到了一个深刻危机的阶段,虽从表面上看来,已明显地减少了动乱,而且在弗吉尼亚州和阿肯色州的一些頑固反抗的地区,还赢得一些象征性消除隔离的胜利。

这个危机淵源于一年以前最高法院提出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維護了学生安置法。这个决定虽在当时很少受人注意,但是它却从根本上削弱了最高法院 1954 年有历史性的裁决,它不知不觉地成了各个强大的对抗势力間的一个事实上妥协的基础。

为了有效地貫徹执行 1954 年的决定,这需要联邦政府采取坚决的并且得到群众支持的行动来保证一切必要的改革。显然,立法和行政当局对联联邦政府的采取行动是半心半意的,是不充分支持的。黑人力量的行动虽然在某些场合是英勇的,在其他一些突发的情况下也是令人感动的,但是他們缺乏坚韧性和战斗性,还不足以填补因政府違約而留下的真空。种族隔离主义分子便迅速抓住这些有利机会,不受道德和社会良心的約束,瘋狂地、无耻地破坏法律。

这个把社会等分的实际效果导致了目前的情况,使哪一方都得不到鮮明的胜利。象征性的消除隔离正在成为一种定型,这种类型的消除隔离只是对原則的肯定,而沒有实质的改变。

像最高法院的決定一樣，它宣告了正義，但它本身不保證千
百萬黑人兒童將會在平等的條件下受到教育。這並不是說它沒
有什麼價值了，它有巨大的重要性。雖然如此，它從根本上改變
了整個運動的面貌，它揭開了漫長而緩慢的、看不到盡頭的變化
的前景。我們已經在北方的城市中看到，在許多黑人居住地區，
儘管對完全消除隔離的敵對態度實質上比南方要少得多，象征
性消除隔離還是變成了一種定型並且一成不變地固定了下來。

這就是危險的所在。完全消除隔離很容易成為一個遙不可
測的目標——大部分消除隔離可能被長期擱置下來，為了要求
社會的平靜，肯定會播下妥協的種子，這種妥協的真正目標只是
在今後長期實行象征性消除隔離。

黑人曾經是 1878 年另一次妥協的悲慘的犧牲品，那時，他
們的完全平等權被聯邦政府出賣了。將近一個世紀以來，他們
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就處於這樣的境地：比奴隸稍好一點，但
沒有真正公民權。

有理由相信，1959 年的黑人在現在爭取消除隔離的鬥爭
中，將不會安然接受任何這種妥協。黑人的鬥爭將繼續下去，但
是，障礙將會決定鬥爭的特殊性質。在社會生活中，這是不言而
喻的公理，即強加於人的痛苦將導致兩種反應：一種是發展健康
的社會組織，用堅決有效的措施來抵抗任何妨礙進步的東西；另
一種是採取一種混亂的、為憤怒所激動的運動來猛烈地將它打
回去，使它遭受損害。它首先為的是要造成損傷，要為了不公正
的痛苦而進行報復，其次它才尋求真正的進步，這是懲罰性的辦
法——既不是根本性的，也不是建設性的。

現在要求暴力的呼聲是產生於後面這一傾向。這裡，人們必
須弄清楚一點，就是對暴力問題現在有三種不同的意見：第一
種，是純粹的非暴力道路，這個意見不能迅速地或者容易地吸引

广大群众，因为它需要特殊的修养和勇气。第二种是在自卫中使用暴力，这个意见，一切社会——从原始社会一直到最发达、最文明的社会——都承认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自卫的原则，甚至包括使用武器和流血在内，从来没有被人谴责过，甚至连甘地也未谴责过，对那些不能掌握纯粹非暴力的人，甘地也许可采取这种手段。第三种是主张把暴力作为前进的工具，主张有远谋地有意识地像在战争中一样组织起来。目前很多黑人都被这种倾向所吸引。这条道路有难以估量的危险，这个危险倒不在于肉体的威胁或牺牲，虽然这是重要的，我们不能设想对人类的生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最大的危险倒在于这样作不能把黑人吸引到一个真正的集体斗争中来，并且使广大的游离的至今尚不支持任何一方的中间集团感到迷惑。除此以外，这还会误使黑人相信这是唯一的道路，并且使他们处于少数的地位，面对人数比他们多得多的敌人，而不可能以这种斗争方式制胜。当黑人在自卫中使用武力时，他不会丧失支持，他甚至可以靠勇气及其所反映的自尊来赢得支持。当他想使用暴力时，他就会引起使用暴力有无必要的问题，而且必然会因它的后果而遭到指责。不幸的是，事实正是这样，不管黑人怎么做，他们的斗争总不可能不遭到敌人的暴力，他们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愿意牺牲的精神来击败这种暴力。但是如果追求暴力和组织暴力，他就不能胜利。这就使黑人没有积极的办法前进了吗？罗伯特·威廉先生企图使我们相信，没有别的集体的和实际的办法。他争辩说，我们要末畏缩和屈从，要末就拿起武器。这个说法大大歪曲了整个问题的。有意义的办法是有的。

黑人能够紧密地组织起来，创造很多不用诉诸有害无益的暴力就能够击退敌人的斗争方式。在种族进步运动的历史中，已经发展了很多有创造性的形式——群众抵制，静坐抗议和罢

工，入座示威，——拒付罰款，保釋被非法逮捕的人，——群众游行——群众集会——祈禱游行，等等。确实，在北卡罗来納州門罗城威廉先生自己的居住地区內，就有一个生动的不用武器或暴力威胁而以共同行动赢得重大胜利的明显例子。当警察非法地幽禁一个黑人医生时，觉醒了的門罗人民就向警察局进军，拥到警察局的會議厅和走廊里，拒絕在他們的同伴获釋以前离开那里。由于不能逮捕所有的人，警察当局便釋放了医生，双方都未打算采取暴力。这个經驗就是那位身受其害的医生讲的。

紧密組織起来的群众进军比少数拚死的人手中的枪杆更有威力，我們的敌人宁願对付一个人数少的武装集体，而不願对付一个人数众多、手无寸铁，但却坚决的人民群众。但是群众行动的手段必須坚持不屈，百折不撓。甘地說过，印度人民必須“决不让他們（指英国人）休息”，他要求他們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每天每周地不断提出抗議。这个方法鼓舞了和組織了印度群众，破坏和瓦解了英国人，它在社会和道德方面教育了它的无数参加者。全部历史教导我們，像波濤汹涌的海洋把巨大的悬崖打成碎石一样，人民不断要求他們权利的坚定的运动，总会使旧的秩序崩潰的。

正是这种斗争形式——通过群众行动与邪恶不合作——“决不让他們休息”——向那些为暴力所吸引和煽动的人提出了一条更有效的道路。这条道路需要大胆和勇敢，因为它不是沒有危险的，它正好面对着恶毒的敌人。它需要有献身精神的人民，因为要喚醒、組織和教育千百万人采取有紀律的和持續的行动，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这种斗争形式比少数有組織的暴力行动能产生更多永久性的和对敌人不利的东西。

目前我們迫切需要的，是停止我們內部的斗争，一致向外对敌，利用一切已有的群众行动形式，并且創造新的形式，决心不

让敌人休息。这是打开走向自由之門的社会杠杆。我們强大的武器是声音，是脚，是有献身精神的人的軀体，是团结起来的人民，是不停歇地走向正义的目标。比南方种族隔离分子更大的暴君，已經被这种斗争形式打垮和击败。我們还没有使用过这种斗争形式，如果因为我們沒有看到它的巨大力量和威力而摒弃它，那将是一个悲剧。

为了澄清任何这样的流言蜚語，說我什么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态度前后不一，并且在反对核战争时太优柔寡断，我可以說，我曾反复地在我的公开演說和我的文章中毫不含糊地宣布过，我憎恨这一个在一切邪恶中最邪恶的东西，并且譴責任何一个战争組織者，不管他有什么地位和是哪一国人。我已經同其他一些美国人一道，签署了許多声明，譴責核試驗，并且，不顾这样照直說在当时是“不受欢迎”的，我允許在国内发行最广的报纸广告中发表我的名字。

（1959年10月《解放报》）

反 抗 精 神

杜魯門·納爾遜

对一个領袖的真正考驗在于他是否有先見之明：他是否具有这样一些品质，这些品质一旦照他那样接受下来，就能使很多人完全脫胎換骨，并且使亿万人改变到願意接受改造的程度。正在南方发生的法律范围之内的革命——在政府破坏法律时維持法律——推出了两个領袖。說来很幸运也很必然，这两位領袖都是黑人，他們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給了彻底解放他們的人民的事业。

一个是馬丁·路德·金，他很有人望，深受新聞界的尊敬，在自由主义者当中和真正的宗教界，都被认为是一位无可訾議的人物。他是一个雄辯家，几乎所有全国性的宣傳工具都为他开放，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项偉大的成就，因为还从沒有一个黑人能在这方面望其項背。他出入南方監獄的日子，几乎已成为全国黑人表示忧伤或快乐的安息日，有各种形式的画片为之作报道。他为敌人所作的祈禱和爱敌人的表示，他的尊严，他的严肃完整的人格的感人力量，以及他的道德立場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切似乎使我們不能再对他提出別的什么要求，只能希望他精力充沛，把一場他經常比作甘地为解放印度奋斗四十年的斗争坚持到底。

另一个是罗伯特·威廉，他同前一位領袖几乎完全相反。新聞界不是把他完全忽視，就是对他进行恶毒的攻击。作为一个逃犯、一个被“通緝”的人，他的像片——現在一直阴森森地張貼在

全国各个邮局的布告栏里，他被說成是一个“全身武装的危險人物”、瘋子、精神分裂症患者。据說他犯了綁架罪，为了規避起訴，非法潛逃，因而要求公民們向联邦調查局告发他的行踪。虽然人們好多个月之前就知道，威廉是在古巴政治避难，然而当局方面却沒有人认为應該撕下這張懲罰性的公告，這張敗坏別人名誉的印刷品。而且，作为緝拿他的借口的那件所謂“綁架”案是如此无足輕重，以致那些現在仍被拘留并被控以同一罪名的人，在事件发生了一年以后还不曾被审訊，而且审訊已經无限期延期了。

如果說美国土地上有什么人看来像是“受損害的灵魂”的話，那就是这个受糟蹋的人，他的一生是不断斗争和逃亡的一生，他現在亡命国外，他的人格在美国的思想中被置于某种可怕的地獄边缘，好像对于他很久以前就为之献身的斗争說来已失去了一切价值。但是，很多人心里都疑惑不解，怀疑威廉是不是这两人中的真正先知。

为了消除这种怀疑，我們可以說：对，他們两人都是先知，都起作用，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但是，历史不容許有这种两个救世主并存的景象。当赌注已經押下去的时候，只能有一个中选的，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而历史总是奇怪地选择那好像最沒有可能中选，和不受大家喜爱的人来充当它的主宰。我必須承认，正是威廉的这种“别扭脾气”吸住了我的眼睛和注意力，博得了我的深刻同情。他已經被排斥在报纸之外；他的处境是困难的；他不能做到爱自己的敌人；他对南方的那些政治統治者几乎永远是破口大罵，絲毫不讲外交手段，这样，上至他那一州的州长，下至北卡罗来納州門罗城的警察局长及其屬員，都成了他不共戴天的仇人，前者曾举行盛大的記者招待会攻击他，后者曾打电话告訴他，要在几分钟內在法院前面的广场上把他吊死……

这一切使我在他身上听到了西奈山上憤怒的声音①。

但是，单說威廉像先知一样，他的声音像銀币敲在大理石上那样准确，那是不解决問題的。另一位圣人也应该得到应有的评价。馬丁·路德·金在他的事业中已取得巨大的进展，对于这个事业，他有着无比的忠誠。他有明确的前进立場，这个立場以前已发生过作用，今后可能还要起作用。在领导蒙哥馬利城抵制公共汽車的运动时，他运用了通过群众行动不和邪恶合作的手段，这一事件引起了全世界对黑人困苦处境的注意。而且，他取得了胜利，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城的公共汽車上不再实行种族隔离了。同时，他是在暴力攻击——包括杀害他的企图在內——之下通过和平方式取得胜利的。在整个过程中，尽管发生了使事态极端恶化的挑衅，他始終坚持着自己的非暴力抵抗政策。

但是，最近在佐治亚州阿尔巴尼城应用这些手段时，虽然引起了广泛注意，却没有达到該地黑人要求种族平等的目的。如果說阿尔巴尼运动是群众性消除隔离的一个基本标志，那末，这次运动所表明的則是停頓或者倒退。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金的手段在这里有問題，最好让它们再受一次檢驗。

馬丁·路德·金发表出来的一条战略路綫，現在已經如此广泛地为人所接受，以致出現了这样一个危險，即：他將成为今天的布克·T·华盛顿②，人們最終將不得不把他当作黑人解放的一个真正障碍来对待。現在，自由主义分子已經在把黑人分为好坏两种，认为那些跟随金的黑人是“好”黑人，跟随罗伯特·威廉的黑人是“坏”黑人。最近，有人問紐約一家主要的自由主义报纸的編輯，問他为什么不全部报道威廉和門罗城的事件。这位編輯显然是迴避問題地說：威廉是个坏蛋。

① 西奈位于紅海北岸，《聖經》中傳說在摩西过紅海时，上帝在西奈山上授予他十誡。——譯者

兩人之間有很多分歧點。首先要提出的一點是，金不像威廉那樣，他絲毫不考慮別人會報復，也不作防范報復的準備。而我們只要看一看佐治亞州阿爾巴尼城的一段新聞報道，就很快會懂得作好這種準備是多麼重要：

“在黑人大學生要求自由後一周，有六輛卡車開來，從車上跳下許多帶着槍支、棍棒和鐵管的人，闖進一個學生家里，把這個孩子以及他的母親和妹妹痛打了一頓。母親的腿被打壞了，腦袋開了花，手也被打得到處是傷，以後整整架了三個月的拐杖。她宣誓後作證，在打她的人當中有一個就是警官。可是，關於這件事沒有提出任何控告。”

威廉說，這類事件是不會在黑人已經武裝起來的門羅城發生的，因為那里的黑人是“有力量的人”。

金和威廉之間有一定的爭論，但并不很激烈，因為黑人比我們聰明，他們不會由於理論上的分歧而互相殘殺。他們雙方都作出了讓步，同意對方立場的正確之處。金說，自衛的原則，甚至是使用武器和造成流血的自衛，“都從未被入譴責過，甚至連甘地也未譴責過，對那些不能掌握純粹非暴力的人，甘地也許可他們採取這種手段。”這裡的推論是，那些比較低一等的人是用暴力來保衛自己的，但我們必須考慮到他們的人性缺陷……或者是缺乏神學教育的情況。

正是在這本書里，威廉說他並不反對金和其他人所主張的

② 布克·T·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 1856—1915) 生於弗吉尼亞州富蘭克林縣，美國塔斯克薩師範工業學院的創辦者，美國著名的黑人教育家。他強調對黑人實施職業技術教育，培養黑人的忍耐性和埋頭工作的品性，反對黑人的政治教育，反對黑人進行政治鬥爭和革命行動，要黑人順從白人奴隸主，說什麼“宣傳社會平等是最愚蠢不過的事”，在當時起了瓦解黑人士氣的作用，因此，受到白人資產階級的贊揚，成為統治階級的盟友和親信。——譯者

消极抵抗，他所不贊同的只是，和平主义的义务給斗争强加上了一重限制，使它缺乏灵活性。但是，在另一些場合，威廉曾經提出过不少應該进一步加以討論的严重指責。他說，成千上万的美元正源源不断送到南方，用以把黑人变成非暴力主义者，收买他們的斗争精神，从而使他們长期保持逆来順受的状态，而他认为，黑人所以受到殘酷剝削，首先就要归咎于这种状态。他說，南方的湯姆叔叔这类人是最典型的非暴力主义者，从目前正在发生的这种斗争形式中也获得了最多的利益。

金虽然口头上也支持威廉，但是除了非暴力抵抗外，他总是把其他一切方法都說成是“二等手段”。我不认为这对威廉的抵抗派会有很大帮助。不仅如此，使我很恼火的是，我认为这种說法本身就是一种隔离，——譬如說，我由于性格或个人遭遇的关系，不能承认完全消极抵抗的正确性，它就把我划为二等人了。这便使我要同金爭論一番，要同他辯論个明白。

作为一个偉大的革命道德傳統的繼承人，我对他的态度感到气愤，我不相信列克辛頓草地之战、康克德桥战役和7月14日国庆都是二等的东西。这样那就可以把照他这种說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偉大的反納粹抵抗运动、非洲斗争的各个方面、以及正在安哥拉形成和剛在阿尔及利亚完成的解放事业，都可以算是二等的东西了。

事实上，这同我們美国的傳統以及，——我相信——全体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基本信念，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致我认为这种态度必須作为錯誤和有害的異端邪說而受到批判，而且金先生應該同其他种族的人辯論整个問題，让是非曲直得到应有的結論。談到种族，我也可以說，我相信在这个国家会有很多很多白人接受金先生所鼓吹的非暴力抵抗，因为这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

唯一真正有創造性的美国和平主义者威廉·路易·葛利逊^①，是如此支持上述观点，以致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否认奴隶使用暴力和暴动作为武器的权利（除非这个人也反对他自己和其他白人、他的政府以及世界上其他各国的政府动用武力），并认为只要任何人手中还有压迫工具，那末只有純粹的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才会否认奴隶有使用同样武器的权利。他在这个問題上的激烈情緒和怨恨，在他評論《黑奴吁天录》一书时充分流露出来：

“到处都这样认为南方的所有奴隶應該拋棄一切現世的武器、避免流血、服从主义、等待和平的拯救、不举行任何暴动——这些在各地都被看做是理所当然，因为受害者是黑人！他們不能以牙还牙，不能图謀消灭他們的压迫者。《聖經》要求他們摺除一切憤怒，无抗拒地忍受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凌辱。为他們的利益作鼓吹的人，决不許鼓励他們仿效希腊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以及我們的革命先輩的榜样，因为这种教导会引起一种最違反基督教义和最殘忍的品质。但是，对那些具有另一种肤色的人来说，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当別人向他們啐唾沫、毆打、侮辱、和压迫他們的时候，可別同白人談什么和平地屈服、以善制恶……千万別来那一套，對他們來說，是让暴君流血！难道有一种专为黑人而設的屈服的律法和另一种专为白人而設的反抗和斗争的律法嗎？当白人遭到踐踏时，基督不会同意他們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嗎？而如果是黑人遭到这样的对待，基督就会要求他們忍耐、长期受苦、馴良和寬恕別人嗎？”

馬丁·路德·金的理論主張据說是半基督教和半甘地式

① 威廉·路易·葛利逊 (William Lloyd Garrison, 1805—1879)，美国廢奴运动領袖，1831年創辦了廢奴周刊《解放报》，1833年創立了美国廢奴社，主張非暴力抵抗主义。——譯者

的，但是，基督教的路綫是很难适用于所謂非暴力积极抵抗那种自封的战斗精神的。《聖經》上有一句与此有关的話說得很清楚，“不要抵抗邪恶，誰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送上去。”要把這句話解釋成“一定要抵抗邪恶”的意思，是需要很大技巧的。金在他的《向自由迈进》一书中強調說，非暴力抵抗是真正的抵抗，而且“最終也就是强者的道路”，也就是說，在“物质上”是“消极的”，但在“精神上”却是十分积极的。我必須坦白地說，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和金博士发生了分歧。我不能想像，除非有什么立刻見效的催眠术阻止凶焰万丈的迫害，否則，人們怎么能从“精神上”抵抗一个迫害者呢？

他所提到的甘地的另一些格言，我也觉得很成問題。譬如說，人們并不想以任何方式击败或制服他們的敌人，以便在斗争之后建立起“可爱的社会”，也不会把对邪恶的譴責应用到任何具体人身上。他說，南方的基本緊張关系不是在白人与黑人之間，而是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間。他觉得，通过爱他們的办法，南方白人将会認識到他們那一方是非正义的，从而产生一种道德上的羞耻之感，以至最后会带来得救与和解。

要使南方白人有羞耻之感，或者使他們認識到这个殘酷的事实，即他們要恢复的并且正在拚命要把它永久保存下去的黄金时代，只是一个占有奴隶、蓄养奴隶、驅逐奴隶和猎取奴隶的人間地獄，那是难上加难的。南方白人的罪过集中在他們忠于种族主义的这种团結上，这种情緒使他們看不到社会的真实情况和各种不滿。我确实不信，黑人們向他們讲几句爱他們的話，就能使他們睜开眼睛，因为他們几百年来一直在蹂躪着这些黑人，而同时却始終声称他們像爱自己的家人一样地爱黑人。

毫无疑問，金的方法是彻头彻尾地渗透着甘地主义精神的，他并且一直在大声疾呼地宣傳，要把这种精神永远銘刻在正在

斗争着的南方黑人的心上。他以赞同的态度引证的甘地的某些话，一味要求牺牲和死亡，听起来和那些态度最强硬的、杀气腾腾的将军们所讲的话一样令人作呕。甘地说，“在我们获得自由以前，也许得血流成河，但这必须是我们的血。”

我觉得这是十分可恶的。为什么甘地或其他任何人竟要把全体人民投进屠宰场服服贴贴地任人宰割，而不许他们进行任何实际反抗呢？为什么要让刽子手杀人杀得腻了，脱去血衫去干别的勾当，并不因为他们杀害无辜而受到惩罚，甚至被过问一下呢？甘地是什么人，他凭什么来决定该流谁的血呢？

金还引证甘地关于必要时乐意进监狱的话，他引证说，人们应该“像新郎进新娘的洞房一样”。这是多么带有讽刺的意味！又是多么的天真！那些进入南方监狱去的年青小伙子实际上比很勉强很害怕的新郎还要痛苦。这些南方监狱里关满了有性欲倒错病的、性虐待狂的以及有难以形容的欲望和暴行的性变态者。

这些下流坯是南方白人的刑罚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对那些由于反对种族主义罪恶而入监的人施以拳打、脚踢、鞭笞以及其他性变态的侮辱，这都是得到政府当局批准，作为执法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些罪行不但被批准，而且还收买犯人来干这些事……这些肮脏的买卖。在威廉的家乡门罗城，就有一个病态暴徒霍华德·斯塔克，他是由于打人而入狱的，有很长一段干这种罪恶行为的记录。这个人在他的自白书上承认，“门罗的警察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我殴打一个‘自由乘客’，他们可以撤销对我的控诉。”

于是，他在当局的纵容下，就把一个名叫理查德·格里斯沃耳德的人打了个半死。这种行为同南方白人的一贯作法是如此

不可分割，以致当人们提出这件事并提出这份书面供状时，美国司法部竟答复说，在他们看来，这并不违反联邦法律，他们已经把全部事件都归档结案。事实是，对那些因反对种族主义行为而被捕的人施行的真正惩罚——事实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惩罚，就出现在他们被监禁的时期，也就是金引证甘地的话所说的像新郎进入新娘洞房的时期。

这并不是说，不值得为这个事业坐牢，但是，用这个运动所特有的甜言蜜语把这种事说得那么美妙，会妨碍人民看清南方监狱中的真实情况——比希特勒的死亡营好不了多少的人类堕落的地狱。在这个地狱里，“自由乘客”在受到五、六个警察照例的痛打以后，还要经受倒扳手指直至折断，以及撕开裤子用高压电刺棒对睾丸用电刑的折磨。根据《天主教工报》报道，在那里，妇女的赤裸乳房、臀部和下身，受到宽皮带的鞭打。根据政府刊物《五十州公报》报道，在那里，有人在受审判以前就被过度的折磨或牢房私刑所杀害，而报上去时却说是自杀。这就是威廉所说的如果保证只用和平主义手段就缺乏灵活性的意思。当你保证爱每一个人的时候，你的对手却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歹徒，你怎么能揭露他的真面目呢？

在金的关于消除种族隔离的路线中，有一个最使人不安的地方，这就是它没有和南北战争以前有历史意义的废除奴隶制度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而那次斗争真正消除了隔离和产生了效果。下文的一些引证实质上代表了美国反奴运动的路线、信条和圣经，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金企图以甘地主义建立的新的圣经，同这些引证相比，并没有引起同样的反响。不仅如此，我认为马丁·路德·金的新经文并没有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扎下根子，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将不得不取消或抹杀掉抵抗精神中最热情洋溢的某些感情。

偉大的廢奴主義者威廉·路易·葛利遜也自稱為不抵抗主義者，也談不抵抗主義。他告訴奴隸們不要暴動，但他所以如此做，是因為深知，如果奴隸們起來暴動，美國政府就會用聯邦的名義派軍隊去鎮壓他們，這是履行各派之間所訂的契約——也就是以容許和支持奴隸制來換取南方在美國革命中的合作——的一部分。

葛利遜感到，必須首先撕破這個不道德的契約，因此，他在《解放報》的報頭上印了這樣的話：“不同奴隸主結成聯盟。美國憲法是同死亡結成的契約，是同地獄作出的協定。”人們原以為，憲法中的這個痛心的缺點可以被第十四修正案永遠消除，但是很明显，在向保卫南方“制度”的南方政客們作出让步方面，它所代表的調和精神今天仍在我們的民族生活中起着作用。

其實，葛利遜最初也和金一樣，說什麼“道義上的勸說”會感化種族主義的奴隸主的冷酷心腸的，但是，在經過了十年徒勞無益的努力之後，他矯正了這個想法。“不論在宗教史或世俗歷史中，都沒有記載過人類的壓迫者和奴役者——除個別人以外——曾經為道義上的勸說所感化，從而放棄他們的專橫權力，使被壓迫者獲得自由；相反的事實是，从古法老王及其軍隊在紅海淹死時代起，直到目前為止，几乎所有的例子都說明他們除非遭到突然毀滅，或者在某種方式下被迫交出他們得來不義的權力，否則總是會一直作惡下去的。在所有那些使人類遭到痛苦和折磨的壓迫者和暴君中間，沒有一個能夠在凶暴殘忍、道德敗壞和用心卑鄙的程度上比得上有色人種的奴役者——特別是美國共和派的奴隸主。我認為想靠乞求於他們的理性、良知和好心腸的辦法，來使他們作為一個整體轉移到被迫害的人類一邊，那正像靠同樣的方法把豺狼和鬣狗改造成羔羊和鴿子一樣毫無希望。他們已經失去理性，和畜生一樣野蠻，他們的良知已經像

被燒紅的铁烙过一样的麻木不仁，他們的心腸比金剛石还硬。”

葛利逊沒有因此而就主張使用暴力，但他从未停止过用火山熔岩般猛烈的一連串咒罵来斥責奴隶主，斥責他們的家庭和他們的整个社会，他把他們称之为凶手、綁匪、窃賊和淫棍，并且使用了一切他所能說出口的刺激性言辞，希望把他們逐出民主制度之外。在观念形态上，他只強調一点：已經在这块自由土地上的种族关系中深深地种下革命矛盾。他当时的时代正像我們今天的时代一样，充滿着革命風暴（他称之为“火光閃爍的时代”），他向那些热烈欢呼希腊、法国和匈牙利革命的人們指出，奴隶們“将从你們的演說、你們的示威和你們的庆祝中得到鼓舞和激励，来反抗他們的穷困。你們不把施于黑人的任何事情视为暴行，但只要触动一下你們的特权，就会看到你們是多么咄咄逼人！”当廢奴运动进入高潮、而南方必需越来越多地利用联邦权力来維護它的制度时，北方有良心的人們就面临着一个他們是否要用暴力来反对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的問題。說我有勇气对任何加諸于我个人的攻击能够像基督那样地不加抵抗，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当你身旁的人遭到野蛮压迫，而你手边就有办法去帮助他时，你又該怎么办呢？西奥多·派克^①在1850年对这个左右两難的問題給了一个有时代意义的回答。

在一次波士頓的牧师會議上，大多数人决定應該把逃亡的奴隶交出去，以信守同南方簽訂的協議，否則就会使全民族陷于毁灭。派克本能地和激烈地反对这点，他說：

“我宁願看見我自己的房子在烈火中化为灰烬，宁願看見我的家人一个一个地被扔进燃梁燒椽的熊熊烈火之中，以至最后

^① 西奥多·派克（Theodore Parker, 1810—1860）美国单一上帝教牧师，有自由主义思想，常对政府提出批評，积极参加廢奴运动。約翰·布朗襲击哈卜渡时，他是秘密策划人之一。——譯者

也把我自己扔將進去，我也不願把那怕是一個逃亡的奴隸送回去。我的教堂里有黑人，有逃亡奴隸，他們是我的傳教士職位的主冠，是我的牧師職務的玉璽。為了拯救他們的靈魂，我有責任照顧他們的肉體。我不得不把自己的教民帶到我的屋裡，免得他們落入綁匪們的魔掌。我不得不武裝我自己，在我寫講道稿的時候，桌上放着手槍，子彈上膛，火門敞開，隨時都準備行動。真的，在我右手够得着的地方還放着一把出鞘的劍。這就是我在波士頓，在十九世紀中葉所作的事，我不得不這樣來保護我的教堂的男女信徒。你們知道，我是不喜歡爭鬥的。我是一個不抵抗主義者，我從來不相信那套胡說。但迫使我去殺人，却不是一件小事情。可是，我該怎麼辦呢？我生在一个革命鬥爭和流血就在那里開始的小市鎮里。在那次戰爭中首先犧牲的人們的白骨，被埋在列克辛城的紀念碑下，上面寫着‘為自由和人類的權利獻身’。這是我讀到的第一個碑文。這些人都是我的至親骨肉，我祖父開了革命的第一槍，今天在我的血管里循環的血同在那里流的血是一脈相承的。當我的面前擺着這些事實，我的腦海中浮現着這些紀念物和回憶的時候，有一個教民，一個亡命者，受到綁匪的追蹤而跑到了我的住宅里，這時候，我除開叫她進來並且保護她之外，試問還能作什麼呢？啊！我的弟兄，我是不害怕別人的，我敢冒犯他們，我不在乎他們的憎恨或尊敬，我也不很介意我的名聲，但是我不敢違犯上帝的永恒法律。”

我認為，這才是一個直接向真正的美國精神，真正革命的美國精神講話的人。這才是美國人對自己的看法，這才是他們所贊美和堅持的東西。這才是美國精神中的永恒和崇高之處，它超越了那些我們為政客所欺而違反本意地支持了暴政和腐敗的不幸事件。如果不斷地告訴黑人，這種精神就是屈從、消極抵抗或忍受別人對他的攻擊，他是接受不了的，這也是同黑人本身格

格不入的。我知道，黑人要抵抗，任何別的人也都是这样。可是，現在却有人不断去說服黑人，要他們放棄抵抗，并且把南方种族主义者要他們接受的那种概念，强加在他們要求抵抗的意志之上，这种概念就是：黑人不應該為他們自己的解放而斗争。这已經够坏了，但更坏的是，还要求他們在身边的弟兄遭到攻击时也不伸出援助之手。在忍受別人对你自己的攻击时，也許确有一种使你感到鼓舞的爱的力量，但是，在援助你的弟兄、在保护他和为他而进行斗争当中，也同样是有着爱的……但是从甘地主义者的言論来看，好像为別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根本没有爱似的。

我觉得，这就是把公开进行抵抗的意志全部包括在美国精神之中的价值。每一个偉大的領袖都知道这点。約翰·布朗的法庭演說中那些具有奇妙的感化力的辞句，就是以这种精神为根据的：“如果我是为了有錢有势的人和所謂大人物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他們的朋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儿女，或者是为了那个階級中任何人的利益而进行这次干涉，并且像我目前这样在这次干涉中遭到了痛苦和牺牲的話，那就是完全对的了。在这个法庭上的每一个人就都会认为这一行动是值得奖励而不是該受惩罚的了。”

沒有誰把压迫者的心情說得比这更透彻的了，也沒有誰把被压迫者的处境說得比这更动人的了。甚至连仍然是一个和平主义一无政府主义者的葛利逊，也不能否认这些話的正确性，“我是一个不抵抗主义者，是一个相信在一切情况下都不得侵犯人类生命的人，因此，我以上帝的名义否认約翰·布朗和南方一切奴隶有权使用武器。但是，我不会就此止步，否則我就会是一个魔鬼。我还要以上帝的名义否认世上的一切奴隶主和暴君有权使用武器。凡是在实行了这个原則的地方，一切枷鎖自然就

会立即化为烏有，在那个地方也就沒有受压迫的人或压迫人的
人了。我希望能依靠向每一个奴隶主的理智和良心呼吁来和平
实现廢奴，我不仅希望，而且还不停地为此而努力奋斗。但是，
作为一个主張和平的人……一个极端主張和平的人，我仍旧要
說，願南方和每一个蓄奴国家中的每一次奴隶暴动都获得成功。
看不出我这样說会損害或玷污我的和平主張。当武器均等的被
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間存在着搏斗的时候，上帝知道我的心总是
向着被压迫者一方而反对压迫者的。与其看到人們脚鐐手铐，
卑躬屈膝，我宁願看到他們举起鐐铐来击破暴君的头顱。作为
一个不抵抗主义者，我宁願看到邦克山、列克辛頓和康克德的战
斗，而不願看到南方奴隶庄园里的怯懦和卑屈。”

我要再問一次，难道这些話沒有在美国人的心灵深处引起
共鳴和反响嗎？难道这不是我們的教育、我們的文化和我們的
民主意志……所賦予我們的义务嗎？我这里所說的并不是五角
大楼的那种新加尔文主义——它把自己的全部毁灭性力量都用
来对付一个这样的敌人，这个敌人唯一可恶的地方就在于它和
我們一样强大或者比我們更强大……，我說的是这些精神的最
好表現，即要求一切别的民族都能得到自由的一个自由民族的
意願，这个民族本能地探索着走向世界大同的道路。

金牧师常常提到亨利·戴維·梭罗是他的理論指導者之
一，但他談的是早期的梭罗。写作《不合作主义》这本书时的梭
罗是一个消极抵抗者，这是沒有疑問的，他不加抵抗地让自己的
身体受到监禁。他相信，他的一些冥想会随着監獄看守“自由自
在地”飞到外面的世界，“而它們才是真正危險的”。但是，只有
在看守是一个善良的、不想改变亨利对任何事物的看法的山
姆·斯塔浦里的时候，并且在第二天早晨瑪丽亚大嬸披上圍巾
來到監獄付清数量微薄的罰款后就放他出去的情况下，才能如

此轻松愉快。

几年以后，当逃亡的安东尼·伯恩斯再度被捕、重被关进监狱的铁牢时，某些曾大力设法营救他的废奴运动者也在波士顿入狱。当时，在弗兰明罕的一次反奴大会上，梭罗怀着不可抑制的愤怒谈到这次监禁说，“我还以为这座牢狱已经烧毁，不再在这片草原上了呢。但是，尽管有好几个马萨诸塞州的公民由于想从她的毒手中营救一个奴隶而被关进了监狱，在堪萨斯会议上却没有一个讲话的人对此表示过遗憾，甚至没有一个人提及这桩事。”

这里一点没有谈到奴隶安东尼·伯恩斯曾经和平地束手待缚和满足于能够自由思想。这里也没有对波士顿公民们的任何谴责，而只有对他们的高度赞扬，这些公民在西奥多·派克的领导下，曾试图用暴力武装营救一个依法被判罪、依法被监禁和被押解回去的逃亡奴隶。

梭罗对马萨诸塞的公民不反抗这次事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他听到他们谈自己的公开耻辱时这样说：“啊，政府，不论你怎样对待我的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和姊妹，我都会完全服从你的命令。如果你伤害他们，把他们赶到海外去让猎狗追逐或者被鞭打至死，那的确将使我感到痛心，但是尽管如此，我仍要和平地继续走我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所选择的道路，直至有一天我为他们的死去而穿上丧服时，我也许能劝服你发出善心。这就是马萨诸塞的态度，这就是马萨诸塞的语言。”

然后，他表明立场说，“我决不会这样做——我毋需说我会碰到什么对手，会破坏什么制度，但是，我既爱我的生命，我将站在光明的一边，让黑暗的世界从我脚下滚开，并且号召我的母亲和兄弟跟在我身后。”

十分奇怪的是，正是在这里，马丁·路德·金的话很像梭罗

曾設法使之再生的懦弱的馬薩諸塞人所說的話。他說：“美国黑人必須做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能用甘地主义式的话向他們的白人兄弟說：我們要用我們忍受痛苦的能力来同你們施加痛苦的能力相对抗，我們要用灵魂的力量来对付你們的物质力量。我們不会仇恨你們，但是，我們不能安然自得地服从你們不公正的法律。你們怎么对待我們就怎么对待我們吧，我們始終是愛你們的。即使你們炸毀了我們的家園，威吓我們的孩子，派遣你們头罩白布的暴戾凶手到我們的居住区来，把我們拖到路边打得半死，我們仍然愛你們。但是，我們不久会用我們的忍受能力挫敗你們。在爭取自由的过程中，我們要如此打动你們的良心和理性，以致将在这场斗争中战胜你們。”

我說，不，永远不能这样！我們已經用无数的痛苦向种族主义者呼吁了两百年，够了，够了，够了！……

美国黑人是一个富裕国度的公民，他們有起来反抗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反抗一切剝夺他們各种幸福的企图。为什么要竭力劝說他們走那种道路来重新爭取他們已經在1776年获得的权利呢？你們知道，黑人当时就在这里，并且和我們其余的人并肩作战——出于同样的革命道德，为了同样的今天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再次強調的革命权利：在法律面前，一切人完全平等，除去由于經過傳統的和民主的正当程序被判决和证实的罪行而丧失掉平等权利外，誰也不能剝夺这些平等权利。

从历史上来看，黑人也一直是具有这些权利的，別人只是用武力和欺騙才剝夺了他們的这些权利，而他們也总是要进行抵抗，虽然沒有效果——并不是跪着抵抗，而是站着进行战斗，直到倒下去成为鮮血和暴力的牺牲品。因此，現在为什么要竭力劝說他們只用“灵魂的力量”和“精神”再忍受一百年的鞭打、轰炸和侵犯呢？难道要再三再四地忍受下去，直到南方白人“愛”

他們为止嗎？那儿是一个瘋狂的社会，除非全国的其他部分起来制止他們，这些人是决不会放下皮鞭的。如果我們說黑人是公民，那么，他們就有来反抗专制和独裁的明确义务——如果可能，就用合法的和平的手段，如果必要，就用暴力。他們是不可剝夺的天賦人权的享有者，即使他們要放棄也放棄不了。黑人并非生来就是拳击家的吊囊，專門被用来試驗南方白人打人的耐久力的。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罗伯特·威廉也引证了梭罗的話，但这是晚年的梭罗，当时梭罗在他短促的一生的最后几年里，几乎已完全贊同約翰·布朗通过哈卜渡口事件体现出的那种革命道德。……

这也是威廉正在讲着和为之战斗的……所不同的只是他是針對我們黑人的情况讲这番話的，而千百万人，特别是千百万黑人发现这些話大都是真实的。他們希望用和平和民主的手段来反对持續不断的封建主义，因为我們毕竟有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明文規定。这项修正案說得很清楚，“凡出生或归化于合众国并受其管轄之人，皆为合众国及其所居之州之公民。无論何州，均不得制定或施行剝夺合众国公民之特殊权利或豁免权之法律，和不得于未經正当法律手續前使任何人丧失其生命，自由，或财产，并不得拒絕給予該州管轄区内之任何人以法律上之同等保护。”

就連知識最差的人也会看得很清楚，这项法令每天都在遭到破坏，在南方更是每时每刻都在遭到破坏。每一項种族主义法律，每一条因肤色而作出的排他性法令都違背了这个修正案。同时也很清楚，这个修正案是革命的，含有不断革命原則的性质。南方知道这点，并且采取它所能运用的各种反革命策略来抵制它。起草这项法律的人使它具有了革命性，但把它付諸实

現，便經常会和南方事实上的政治結構发生正面冲突，两者之中必須有一方承认失敗。在通过这项法律，特别是在使这项法律充分完备时，它象征了黑人和白人要使之成为民治制度而共同努力。廢奴运动者提出了它，南方联盟的失敗使它势在必行。人們公开承认，它“使国会有权强制任何一州在战时或平时給予非洲人以自由。”

我們国家的悲剧和耻辱的根源就在于，这个使我国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全国都得到保证的綱領，这个曾两次为宪法修正案和一次为战胜了总统否决权的立法机构法律所通过，并在1954年經最高法院一致予以基本确认的綱領，竟在国家一大片地区遭到粗暴的破坏，而未受到像惠特曼所說的“及时給以恰当惩罚而不使之有一絲逃脫机会”。

威廉要在他的居住地区培植的，就是这种認識到自己是公民、是人的意識。如果政府不采取应有的措施保护他們的权利，那么，他們就必须自己来保护。他只是不願意承认，他作为一个黑人就不应享有白人所享有的任何特权和豁免权……特别是如果这些特权是政府結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由政府資金开支的話。因此，他认为，这就赋予他以一种比南方城市擅自通过的种族主义法律更具有合法性的权力。这就使抵抗成为美德，成为一項爱国主义和維護信仰的行动。

他所做的事在以下各章中得到介紹……他所做的是通过实际行动、以身作則、頌揚和詩一般的贊美、通过把自己的生命置于为反抗精神的日益甦醒而斗争的战綫上来，从而喚起自己的兄弟。他所做的虽然比不上基督的登山訓众，但可以和列克辛頓之战相比而无愧。

如果說，在黑人居住地区有什么真正的抵抗运动的話，那就是——过去是，也許現在仍然是——在北卡罗来納州的門罗城。

可惜的是，如果說它也是整個解放運動中的轉折點的話，那末這還不曾為千百萬群眾所充分了解，因而還不能以此改造自己。不言而喻，人們是應該了解它的，美國人民應該有機會改造自己，應該把奴隸和種族主義分子從他們的思想深處驅逐出去。

梭羅談到一些美國人最難接受的預言家約翰·布朗時說，“追溯過去，我們想不出任何偉大的、或者更聰明、更善良的人能和他相比，因為在當時當地，他高出于他們一切人之上。這個國家要絞死的人，看來是這個國家里最偉大、最優秀的人。不用幾年就會發生輿論革命；在這方面，每一天，不，每一小時都在發生着顯著的變化。”

但是，約翰·布朗在當時還能得到充分詳盡的報道，還能在感興趣的報界得到正大光明的研究和審視。而威廉和勇敢的門羅黑人現在却不是受到污蔑和誹謗，就是必須無聲無息地和艱苦卓絕地進行他們的抵抗。世界其他地方不知道他們正在做的事，甚至連他們的名字也不知道。不過，約翰·布朗那般人本來也是一個極端主義者的小組織，不聲不響地工作了很多年，然後由約翰·布朗把它推上了一個光輝燦爛的頂峰，使得那繼承和革新我們的革命原則的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概念得以生存下來。因此，威廉和門羅的黑人也可能會最終成為解放的使者，使所有出生或歸化于美國的人都變成真正的公民。